

一、国会能代表国民吗？

“两议院是由代表全体国民选举产生的议员所组成。”（宪法第四十三条）。可是，成为现实国会议员的人们，不是职业和地区的承包人，就是电视演员或者以宗教团体为后盾的人。

1. “不代表全体国民的议员”的诞生

不幸的开端

从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日本国会开设以来八十年间，现代被称为民主政治的时代，二十岁以上的所有日本国民都给予平等的选举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进行的第三十二届大选不用说也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可是称为平等选举权和被选权的民主政治的前提，正在逐渐变成了残骸，这是战后的实际情况，这就给日本民主政治的将来投下了不安的阴影。

如果把八十年间的日本政治史分成几个“阶段”，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一八九〇到一九二四年的“困顿政治时代”，第二时期是把一九二八、九年作为中心的“政治家寿终”的时代。接着，迎来了一九四八年“一亿总政治家时代”，一九六七年政党的多党化现象出现，国政可以说进入

了“包办时代”。在这里，把这四个时期具体说明一下。

一八九〇年二月十一日制定了我国最初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议会政治好容易就绪了。该法把选举权限制在每年缴纳十五圆以上的国税缴纳者身上。不仅如此，众议院的职能仅仅是作为天皇的统治机器存在，从而受到极大的制约。在同年的六月四日，公布了贵族院伯、子、男爵以及多额纳税者议员改选规则。实际是承认了没有国民选举的议会的存在。国民选举贤良，又为选举贤良而提名候选人是加大限制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时期是“闭锁政治时代”。

并且，对这样的闭锁政治，国民既没有实际亲自参政权，又不能提出主张。原因是一八九〇年开始的议会政治，是由于被剥夺权力的爱国公党（板垣退助系）、再兴自由党（大井宪太郎系）、大同团结（河野广中系）等所谓自由民权派对开设议会的要求，“当权者”的萨长壘魁藩阀政治家对他们妥协的结果而诞生的，一般国民的要求没有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余地。诚如一分日刊报纸所批评的：“把我国选举法中的选举权的资格同欧洲各国相比是过于狭窄的。”（一八九〇年七月三日《读卖新闻》）但当时的日刊报纸是偏于一党一派的政论报纸，其批判也是从特定的政治立场出发的。

这样，一八九〇年七月一日的选举在三府四十二县进行，选出了三百人，其名单是：中江笃介（自由、大阪三区、思想家）、尾崎行雄（改进、三重五区、朝野新闻论者）、小坂善之助（中立、长野一区、信浓银行总经理）、犬养毅（激进、冈山二区、朝野新闻记者）、竹内纲（爱国、高知一区、矿产业）、植木枝盛（爱国、高知三区、思想家）、河野广中（大同、福岛三区、思想家）等，帝国议会是由压

倒多数的自由民权主义者和少数界财人氏、县议会议员等人所组成。这次选举的结果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自由民权主义者来说都得到了应有的满足。

其次在一九〇〇年，尽管众院的选举权得到了扩大，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制定了治安警察法，国民集会、结社权被取消了，社会运动以至于劳工运动都遭到彻底的镇压。更在一九二五年实行男子普选制，废除了附带财产条件的选举权的限制，给予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选举权（有权者由三百万人增加到一千三百万人），但仍然不允许妇女参政。

政治家死亡了。

不过，其后，议会政治多多少少还是向国民开了一点门户，这也是事实。男子普选权实现以后，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的第十六届选举中，选出了森恪（栃木一区）、三木武夫（东京一区）、鸠山一郎（东京二区）、安部矶雄（东京二区）、永井柳太郎（石川一区）、尾崎行雄（三重二区）、水谷长三郎（京都一区）、山本宣治（京都二区）、西尾末广（大阪三区）、铃本文治（大阪四区）、河上丈太郎（兵库一区）、斋藤隆夫（兵库五区）、犬养毅（冈山二区）、浜口雄幸（高知一区）、中野正刚（福冈一区）等。这些人当中至少在当时是有“气魄”的所谓政治家之类的人物。不论他们的思想以及志向如何，总之，以“国民”为基础的第一代政治家出现了。

但是，议会政治建立以后，虽然迎来了约四十年的“政治家时代”却又被偷偷到来的军靴脚步声给踢开了。有的政治家不但迎合军部、还与其合作，有的则由于严厉的镇压而抹杀了本来的形象。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山本宣治（劳农党）在神田宿舍被右翼杀害这件事可以说是“政治家时代结束”

的象徵事件。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的《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议员尽管早在一个月以前就有遭到袭击的传闻，但（身边的警备）却不注意宿舍的安全，警视厅只在政府高级官员的身边给予十余名警卫。正在政治警察日益遭到谴责时，包括警察总监及其下属当然有责任。”经常谴责往往与右翼相勾结的当局的态度。

然而，由于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接连发生的苦迭打，及太平洋战争暴发等，就连这个《读卖新闻》也开展了声援体制的运动，发表了下列报导：《暴戾·对美英宣战布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御楯的决心·尽忠学徒的大阵势》（一九四三年十月廿一日）、《壮烈·冲绳军官民一体的斗志》（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六日）。展开维护体制的宣传活动。

从一亿政治家时代走向包办时代

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无条件投降，议会政治也迎来了自由化时代，这就成了我国议会政治第三期的一亿总政治家时代。根据新宪法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女子同男子同样给予普选权，为了实现大体上完全的政治民主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进行的战后最初的众议院选举中，不只把认真考虑政治的人，而且把政客、沽名钓誉者、不定职业的人等等互相掺杂地都立为候选人。与其说是政治自由化时代，不如说是政治混乱时代更为恰当。

在这样的众议院中，除了所谓“政治家”的鸠山一郎、铃木茂三郎、德田球一之外，还有歌唱家（石田一松）、杂志编辑者（原健三郎）、小姐（山口静江）、江湖商人头目（铃木仙八）、护士（山崎即滕原道子）、少壮官僚（早川崇）、大学教授（铃木义男）等被选进国会。

另一方面，参议院也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的第一次选举开始施行了普选。这次选举如像鱼铺（青山正一）、古董商人（大山安）、天理教干部（柏木库治）、汽车司机（蟹江帮产）、寺庙住僧（来马琢道）、作家（中野重治）、剧作家（金子洋文）、公司负责人（藤井丙午）、牧场主（町村敬贵）等不同色彩的人参加。

当时我国由于所谓占领的压力，“输入”的民主主义制度未成熟，但是，总觉得给全体国民带来了走向光明前途的希望。可是，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间粮食的紧张状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还不能说是富裕。正因为日常生活较艰苦，市民们有追求政治的某种可能性而积极参与立候选人。

这样，在当选者中也有了这样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名誉，或者是为了想让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能看到，甚而有的被说明了的人、有被捧上台的人，更有的人是受到威胁而进入了国会。”（亨利·菲利——英国政治评论家），特别是政治上无党派的绿风会，由于有所谓一些以弹压为目标的“冒险家”“闯运者”的存在，绿风会则出现了更多当选者，这是象征“一亿总政治家”时代的现象。

行业和地方的包办人

那么议会政治的第四期的现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特意命名为包办政治家时代，已在前面叙述了。现代的政治家有时是为了把特定职业集团、而有时是为了把特定地区的利益反映到政治当中来，而被召集到国会里的。

一九六七年的众院选举，以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为母体的公明党有二十五人当选为议员，迎来了政党党化的时代。而且在一九六九年的众院选举中，公明党的势力更成倍增长至四十七人，推进了多党化。诚然，如同



为中心的五〇年代的后半期同两大政党时代比较，政党数目增加了。但是多党化不能说仅仅是从对政治的运营、政策纲领的根本对立而产生的。

自民党的福田赳夫（原藏相、原干事长、原首相）说：“不是政界的多党化，是在野党的多党化。”姑且不论其意图，就这个发言来说是巧妙的。且不论党的“方针”和思想体系，如探索党的“本意”，社会党和民社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之间有多少政策方面的对立呢？民社党在行动上稍比社会党“进步的”议员，公明党的政治性行动同社会党基本上相近，有急进的一面。如从政治学上来谈，社会、公明、民社三党并立是没有意义的。况且，三党并立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极而言之，在三党的背后有不同的“委托者”。每年，医疗费上涨一旦成为问题，社会党的医师出身的议员都是遵循医师会的意图去解决问题。如从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论来说，全部医疗金额是国库负担的原则，当然同主张医疗费经常提高的日本医师会的立场是不相容的。可是，同社会党医师出身议员：“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职业？”他们必然选择职业。同原则相比取本意，同自民党的医务议员在内部，进行“共斗”。

可是，如果规定现在是包办政治的时代，连这个奇妙的现象也说得通。社会党的医师出身议员，一遇到这个问题，仅仅忘记了所谓工会的二次委托者？放弃了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则，而要注意所谓医师会对于该当议员来说更是身边的委托者，要为其进行工作。结果，自民党通常代表资本家、官僚、地主；社会、民社两党代表工会的一部分，公明党代表特定的宗教团体的利益、贯彻其委托者包办政治团体的意

图。那么就由这个具体事实来证明一下国民党各

各党众党员出身一览表(1970年2月1日)

出身	自民党	社会党	民社党	公明党	共产党	无所属	计
官僚	76	4	3	0	0	0	83
国营公司干部	0	0	0	0	0	0	0
特殊法人干部职员	0	0	0	0	0	0	0
地方首长	13	6	0	0	0	1	20
地方议员	43	7	8	22	1	0	81
地方公共团体职员	13	1	1	1	0	0	16
党专职人员	0	1	0	0	2	0	3
议员秘书	22	1	1	0	0	0	24
团体干部	16	5	3	18	1	0	43
公司干部	57	2	4	2	0	1	66
国劳	0	8	0	0	0	0	8
全通全电通	0	9	0	0	1	0	10
教育工会	0	9	1	0	2	0	12
农民联合会	0	7	0	0	0	0	7
煤矿工会	0	1	0	0	0	0	1
其他工会	0	14	9	0	1	0	24
大学教授	3	2	0	0	0	0	5
办学校教员	3	0	0	0	0	0	3
医师	5	4	0	0	2	0	11
律师	11	4	1	0	4	0	20
新闻记者	28	4	1	3	0	1	37
各种作家作曲家	0	0	0	1	0	0	1
其他	10	1	0	0	0	0	11
计	300	90	32	47	14	3	486

因加入自民党而成为官僚

一九六四年一月据自民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该党基本宪章提出“我们要打破陈规漏习，确定公党的伦理，作为充满智慧和创造性的现代国民政党向前迈进。”然而，从内心把自民党看成是真正的国民政党的人是没有的吧！那么，怎么

各党参议员出身一览表（1970年3月）

出身	自民党	社会党	公明党	民社党	共产党	二院俱乐部	无所属	计
官僚	48	2	0	0	0	0	0	50
国营公司干部	3	0	0	0	0	0	0	3
特殊团体干部职员	1	0	0	0	0	0	0	1
地方首长	2	2	0	0	0	0	0	4
地方议员	16	7	4	1	0	0	0	28
地方公共团体职员	2	0	0	0	0	0	0	2
党专务人员	0	3	0	0	2	0	0	5
议员秘书	1	1	0	0	0	0	0	2
团体干部	17	3	2	0	0	0	0	22
公司干部	27	1	2	0	0	0	0	30
国劳	0	9	0	1	0	0	2	12
全递	0	11	0	0	0	0	0	11
教育工会	0	9	0	0	1	0	0	10
农民联合会	0	4	0	0	0	0	0	4
煤矿工会	0	3	0	0	0	0	0	3
其他工会	0	7	0	4	0	0	0	11
大学教授	0	2	0	0	0	0	0	2
办学校教师	4	0	2	0	0	0	0	6
医师	4	2	3	0	0	0	0	9
律师	4	1	0	0	0	0	0	5
新闻记者	2	4	5	0	0	0	0	11
各种作家作曲家	1	0	0	0	1	0	0	2
其他	5	3	2	0	0	3	0	13
计	137	74	20	6	4	3	2	246 欠4

看的呢？不还是为资本家、地主、官僚利益保护的政党吗？从自民党议员的班底来看，都是由距离“国民政党”较远的一些人组成的。

不妨看看前面各党议员出身一览表。在自民党的三百名议员中，相当于四分之一的七十六人是官僚出身。能称得上官僚者社会党只有四人，民社党只有三人，同自民党比较起

发迹于官僚出身者 (1970年2月1日)

派别	姓名	学历	议员前的经历	大臣、党干部经历	当选次数	生年
佐藤派	佐藤荣作	东大法	运输次官	官房长官, 邮政, 建设, 大藏, 通产, (现任首相)	9	1901
	爱知揆一	京大法	大藏银行局长	通产, 经企, 官房长官(2) 法务, 自治, 文部, 外务	6参1	1907
	增田甲子七	京大法	北海道厅长	运输, 劳动, 防卫	9	1898
	大桥武夫	东大法	内务省复兴院局长	国务, 法务, 劳动, 运输	9	1904
岸・福田派	岸信介		商工次官	商工, 国务, 外务, 首相	8	1896
	福田赳夫		大藏主计局长	农村, 大藏(原干事长)	8	1905
前尾派	前尾繁三郎		大藏主税局长	通产, 国务, 科长(3), 总务会长	9	1905
	黑金泰美		仙台国税局长	官房长官(3)	7	1910
	东周英雄		农林省局长	农林(2), 国务, 自治, 经企	9	1898
	福永健司		埼玉副知事	官房长官(4) 国务, 劳动	9	1910
	大平正芳	东商大	大藏省课长	官房长官, 通产, 外务(原政调会长)	8	1910
	宫泽喜一	东大法	大藏大臣密书官	经企(2) 通产	2参1	1919
川岛派	椎名悦三郎		商工次官	官房长官, 通产, 外务	6	1898
	藤校泉介		县副知事	总理府长官, 防卫, 自治, 运输, 付议长	8	1907
石井派	滝尾弘吉		内务次官	文部, (4), 厚生	8	1899
村上派	神田博	法大专门部	县课长, 内务省	厚生(4)	8	1903
	福田笃泰	东大经	总务次官	总理府长官, 防卫, 行营, 北开	8	1905
园田派	根本龙太郎	京大经	满洲国参事官	农林, 官房长官(3), 建设	9	1907
船田派	水田三喜男	京大法	内务参事官	大藏, 经企, 通产, 政调会长	11	1905
中曾根派	中曾根康弘	东大法	警视厅警视官	国务, 科技, 运输, 防卫	10	1920
其他	野田卯一		大藏次官	建设, 北开, 行营	3	1903

来，自民党如何地“官僚化”是一清二楚的。政治研究家杉森康二氏介绍的一九六七年十月开始“发迹”的自民党议员情况现在自民党议员二百八十三人（当时是自民党系无所属议员二人后来也加入了自民党）谈到，逐步升为中央政府的科长——局长——次长的精悍的官僚出身议员等于五十六人的半数，二十八人当上了大官，说明这些人同地方的町村议会和县议会“锻炼成为”国会议员的地方政治家有大官经验者十人（全是地方政治出身者占百分之十四点五）比较起来，不成问题的“发迹”较早。（《自由》一九六八年五月号）。在一九七〇年一月的内阁改组中，共十九名阁僚中有九人是官僚出身。

那么官僚能够“控制”自民党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战后由于主要干部的被开除公职而失掉人材的保守党，劝诱了尽管由于战败而未动摇的官僚加入多数的保守党。以长田莪为首，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人都是由官僚加入了保守党。战前虽然也是从官僚加入保守党的人很多，但像池田这样由大藏次官当了藏相，佐藤由运输次官进而当了官房长官的例子还不太多见。这也只能说是保守党的人材缺乏。

第二是官僚在选举中强而有力。我国的官僚体制已在明治末年确立起来，完善了天皇下达命令系统。因此，如一省厅的次官立为选举的候选人，该官厅的权力机构直到基层全部行动起来聚集选票。在一九六五年的参院选举中，接受专卖国营公司的援助立为候选人的小林章民，从地方专卖局到最基层的香烟小卖店都动员起来收集选票。其结果，一旦基层香烟小卖店员被抓住，“顺蔓摸瓜”将要发生直到最上层也被揪住的事态。

使选民们大吃一惊的是原大藏次官佐藤一郎氏（后为参

院议员)的例子。一九六七年一月，在神奈川地方区进行参院补选，自民党没有适当的人选。在那立候选人截止之际，原来予定参加众院选举的佐藤一郎氏辞掉大藏次官职务，呈报出马当了候选人。如果说佐藤与神奈川县的关系，大约他当过横浜税务署长。可是一开票，与一般的预料相反，佐藤氏仅以几票之差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向天下显示了“官僚强大”。而且，在一九七〇年一月改组内阁改选时，佐藤氏以二年生的议员打破参院自民党的“惯例”就任经济企划厅长官。

如在选举中取胜，必须有地盘、金钱、地位。这三个条件在日语中称为“三盘”。这样官僚有牢固的地位和地盘，其上面得到保守党给予金钱方面的照顾，不当选就奇怪了。

官僚出身者不用说是要充分利用官僚的充沛精力。特别是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的各部会的干部被官僚出身者所占据，他们以所谓政调干部，同自己出身官厅交际，为把官僚的意见反映到政界而东奔西走。其中建设省出身议员——政调建设部会——建设官僚、文部省出身议员——政调文教部会——文部官僚、农林省出身议员——政调农林部会——农林官僚、厚生省出身议员——政调社会部会——厚生官僚等这种牢固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仰权力者鼻息的记者出身议员

自民党内次于官僚势力者，除公司干部五十七人外，有地方议员出身者四十三人，新闻记者二十八人等。其中地方议员出身者是由县议会议长，副议长的县议会首脑进入中央政界的，也有从市长、町村长的首长转为地方议员——国会议员的，还有身为地方议员的同时，还是经济团体的干部，有这种背景而进入中央政界的人等，有各种各样的人。

说起这些地方议员，完全没有地方议员同士の横向关系，作为政治家的实力几乎等于零。尽管如此，他们在选举中还是强有力的。为什么呢？他们是特定地区和团体的受委托者，要为委托者做出粉身碎骨的努力。当选十几次的议员也当不成大官，连续当选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其变化是随之他们的本地区和委托团体的颜色变化而变化。每年一到十二月的政府予算案制定期，就带来大批陈情者，同政府、自民党干部进行谈判的人大都是这些地方议员出身者。他们虽然没有官僚出身者那样显赫的地位，总是有如军级在选举中当选的“地盘”，特别有地盘作保证。

与此相反，新闻记者只有地位，他们往往成为强有力派为首领的秘书，以此保证有地盘和金钱进入政界。因此，新闻记者的时代曾是“进步性”记者也同样可以进入政界不得不依靠派系和权力。他们的委托者不用说是派系的首领和其他政界大人物。

因此，新闻记者出身者利用其在记者时代集累的知识为其“首脑”在派系的午台里工作，在国会对策等“圈圈”里，在次要的工作中施展才能。然而像官僚那样地道地政策功夫是较弱的，加之，因为同地盘、金钱比较无缘。趾高气扬，常被讥笑为“没有像新闻记者出身的议员那样傲慢无理的人物”。像现在的新闻记者出身的议员毕竟不能步入自民党的“主流”，可以看做是“陪衬者”。

进入荧光屏的议员

现代是大肆宣传的时代。想效法政治家的人以前都是靠人盯人（人对人）的方式来收集选票，现在靠广播、电视、报纸等亮相来提高效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对候选人来说作为宣传对象的选民相当多，尤其是在参议院全国区的候选

人，想在二十天的选举运动期间亮相，不是超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电视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的普及率，通过眼和耳向选民宣传的力量是极为强大的，什么力量也难以代替。

在这里，一般说与政治无缘的电视演员能够进入政界是有理由的。自民党的某藤原秋（资生堂化妆品部长）、森田玉（作家）、八田一郎（摔跤教练）、今东光（作家）、石原慎太郎（作家）、大松博文（排球教练）等各氏（都是参议院全国区）都进入了政界。

他们的选举运动真是轻松愉快呀！在一九六八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今东光氏在选举演说中勇敢的说：“最愚蠢的是自民党，我想要把它纠正过来”。大松博文氏说“要战胜苦闷的我”“我不干谁干？”“彼此要结成更大的爱情哟！”先推出这些根性论、精神论的得意演技给大家看，而把政见抛到了一边。

投这样的电视表演者一票的选民是对选举不关心的人吗？对特定候选人的当选如否无直接利害关系的选民，对在包办政治下委托者（有利害关系者）和受托者（议员）的勾结早就怀有不满。其结果，竟然投完全是政治外行的电视表演者一票，以解胸中的不平。

可是，没太听说这些电视演员进入政界活跃的消息。藤原秋氏在国会里仍然是穿和服“卖东西”的老样子，森田玉氏穿着碎白点衣服的样子。如果说作为议员工作，仍为遵照党干部的命令出席委员会和议会会场，为“凑人数”只不过被当做一个“棋子”挪动。

森田氏在一九六八年不当参议院选举中的候选人，从政界引退仍过着原来作家生活。森田氏恐怕认识到了作为演员候选人的界限了吧。据新闻论说委员高木健夫在某月刊

杂志上告诫当时当了“参议员候选人”的今东光氏说：“虽然人们知道你是雄弁家，如果当了国会议员也只能根据党干部的命令在国会的走廊里当跑腿儿的，“可别赐死”可别当候选人哪！”当选后的今东光氏正好像高木氏指出的那样变成了“跑腿子”。

地方议员、公司干部出身议员在自民党内的数量较多。可是，至少作为“国会议员”的才干、见识，同官僚出身的议员比较起来就相当落后了。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把所谓“国会议员”的职务作为“晋升阶梯”，乃至为得到权力的平等加以注意。考查一下地方议员成为国会议员前的经历，是县会议员或者县议会的领导人、自民党地方县联合会的领导人等很多。他们是以地方议会推举出来的形式而进入中央的。

作为“黑雾议员”在报纸社会版得到关照的也是他们。具有鹿儿岛市、县议员经历的上林山荣吉氏（当防卫厅长官当时的还乡事件）、原籍爱媛经营运输公司的关谷胜利氏（大阪出租汽车贪污事件）等都是其典型人物。

社会党是工会议员集合体

如一九三五年一月，依靠大工会的力量才得以维持社会党的存在。社会党的众院议员的九十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三即四十八人纯粹是工会出身者。其中有国劳、全递全电通、日教组等三大家。每年，社会党一开大会，左右大会局势的大会运营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由主流和反主流两派争夺。这时，两派都出国铁出身议员进行决选投票例子颇多，于是就有“社会党大会等于小国劳大会”等带讽刺意味的说法。

一九六八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也是社会党以多至十六人的工会出身者担当候选人，远远超过官僚出身候选人（全是

自民党)的十人。虽说社会党是以工人为中心的大行政党，总觉得欠缺“大众”方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总选举的惨败是与此有重要联系。

这些工会出身的议员同官僚比较起来显得视野狭窄，把出身工会(委托团体)的斗争好像想要带进党内。其典型是参议院的野野山一三氏(国铁出身)。该人在国铁工会时期作为书记长虽然发挥了才干，但作为国会议员的实力几乎近于零。加之，遇到与国劳不同的事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弄到党内，因此品质是恶劣的。“包括佐藤荣作在内，在执政和在野党中像国铁出身议员那样讨厌的人是没有的”，这样的传言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社会党议员中，同工会出身、地方议员出身者比较，强有力的的是党务工作出身者。社会党同自民党比较起来，大体是有组织的政党、具体从事党务运营的书记局员是具有相当大的权限的。这样的党的专务书记局员出身的议员类型可分为政策型、谋士型两种，多半是谋士型。同工会出身议员不同的是，工会比较自由，而党务出身的议员忠于党的派系这一点超过了工会出身的议员。

同样，在担当社会党议员的地盘、金钱的工会中没有立足点的党书记局出身议员，除了借助派系的力量以外，是无法成为议员的。这一点同自民党的新闻记者出身议员有相似之处。社会党的派系到什么时候也未能没有，因为这些书记局出身议员和工会出身议员在派系性市场上结合得牢固是难以解消的。消除社会党的派系在于该党的现代化，除了尽早从工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党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民社党是“工会党”，为从受工会委托者党脱胎出来，

正在进行适当的努力。在该党众院议员三十二人之中，纯粹是工会出身者只有十人。

民社党在一九六七年的总选举中乘河村胜(国铁理事)、折小野良一(宫崎市长)两人当选之机，在一九六八年的参院地方选举中为期待会计师(北海道)、律师(东京)、官僚(福岛)等的当选而战斗。

当然，民社党这样撒手的倾向肯定是不行的。原因是①、民社党没有把所依靠的同盟，很好地用于选举中去；②、为领导公明党必须靠有见识，以当选为主来选择候选人等，从这个理由出发，让自民党公认的漏掉候选人出来担任民社党候选人这件事可见民社党进一步急剧右倾化了。民社党推立右倾的候选人，因此，民社党的委托者中右倾的人增加，作为党也不得不向右转了。尽管如此，河村氏当了候选人前夕，在他原籍的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一举获得一千五百人的民社党员。社会党的工会出身议员、党书记局出身议员没有冷静反省自己的行动的必要时吗？

宗教政党的成长地位

不谈公明党的事情、谈宗教政党的事情是不行的。公明党的前身是公明政治联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创立当时，也有说是创价学会的“分店”的公明政治联盟，在参院有九席、在都道府县议会有七席，在市、区议会有二百六十八席，在中央和地方具有合计二百八十四席的势力。这样公政联就在一九六四年发展成为公明党。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在众院有二十五席，在参院有二十席，而在地方获得一千八百七十三个议席。

一九六八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全国区拥立九名候选人，在五个地方区拥立十四名候选人，使全国区候选人全部当

选。还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总选举中，拥立多至七十六人候选人中出现了四十七名当选者，其跃进形势则令人瞠目而视。

公明党势力这样急剧增长的原因是：①在腐败的自民党、依附于工会的社会党、右倾化的民社党之间隙填补了空间。②作为远离政治的贫民阶层的受委托者登上台。③据说有一千余万人家庭的创价学会信徒（委托者）原封不动地可利用于选举运动。④不被看成原有政党，而成了随意投票的对象。巧妙地利用反驳公明党等于创价学会的宗教团体的是自民党和民社党。自民党在一九六八年参院选举中以生长之家、西本愿寺，民社党以立正佼成会的背景拥立候选人，经过活跃的战斗的结果，取得了超过予料的成績。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宗教政党，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确保第一党，出现了阿登纳等三代首相。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荷兰的天主教人民党等也都掌握了政权，不可轻视宗教政党的势力。只是这些诸外国的宗教政党不像公明党与创价学会，政治团体（受托者）和宗教团体（委托者）结合得那么坚固。尽管如此，在我国像对真宗这样拥有很多信徒的宗教团体如何利用，它对政治势力颇有情愿服务的可能性。像潜在的委托者（信徒）这样，受委托者（宗教政党）的力量不大，意味着宗教政党在今后的政界处于成长地位。

同宗教的政党相对照“不走运”的是妇女候选人。一九四六年的第二十二届总选举时虽然实际上是三十九名妇女候选人当选，可是其后的妇女议员减至十五人（二十三届），九人（二十五届）、七人（三十一届即一九六七年一月），从二十二届直到三十一届连续当选的只是山口下枝（自民党）、户

叶里子（社会党）两人。山口下枝从社会党转向自民党，也可以说是把失去了“妇人神通力”的自民党的地盘、金钱补上了。

在参议院一九四七年第一次选举以来虽然大体维持十人左右的妇女议员，而这些议员是在妇女团体、助产士团体、护士团体（委托团体）等强有力的推动下才得以当选的。妇女有选举权者还没有意识到把妇女候选人送进国会的时候，能否男女平等化还是未知数。顺便说一下像岸信介和佐藤荣作、船田中和藤枝泉介、中山正晖和中山太郎（均为自民党），山田太郎和山田微一（公明党）等各氏的父子议员、兄弟议员都是稳定当选的议员。兄弟议员同演员议员同样，说不定是因兄弟引起不太关心选举的选民的兴趣。

激烈地事前选举运动

自民党的官僚、社会党的工会出身者，不用说是履行通往国会议员的道路，但光凭这个也不一定能当选。这些官僚出身者、工会出身者时而靠地盘、时而拿出金钱，只有充分运用地盘、金钱、地位不能当选。在具体的选举公布之前到处撒钱，借时局演说会的名义搞讲演会等，围绕公职选举法，只有搞好了事前竞选运动，才有当选的可能。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参院选举投票日的五个月之前的二月下旬，以群馬县为地盘的自民党议员，在高崎市的音乐中心召集三千三百人听众，召开了后援会、联合会的成立仪式，其中有三百名医师参加了会。这些医师是临时停诊特意召集到音乐中心来参加会的。当然，这样的医师们（委托者）从候选人（受委托者）当选后得到方便、讨到好处是自不待言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召开了全国

建设业者大会（会长地崎宇三郎氏，二万四千三百个公司参加了）规模更大了。不管怎么说，平日得到该组织“关照”的众议院议员，约定在同年七月选举中给予“关照”的参议院议员等自民党议员一百二十三人都来参加大会，从而使国会审议由于必须到会人数不足而停止了会议。“不为广大多数国民，而为特定的委托者”的所谓“包办议员”的本质如实地暴露出来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众议院选举前的民社党候选人渡边武三的事前运动，使同一选区的自民党候选人也感到惊奇。渡边氏以丰田汽车总公司工会委员长的头衔出马竞选，这个选举实质上只是劳资双方会谈，工厂车间的股长和工会的车间委员交互查访自己科内和车间内职工的家庭，把工作做到本人和家庭这种彻底的作法。丰田汽车公司下面的承包工厂的干部作为渡边氏后援会的干部“率先”奔走于选举区。同样。因此，即使是得罪了总公司，在丰田汽车公司下面作为承包公司的资格也会得到的。渡边氏的委托者与其说是丰田汽车公司工会不如说是丰田汽车公司。

日本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日本国民是通过正当选举出在国会中的代表而行动”，更在本文中有如下叙述。“参众两院是由选举产生代表全体国民的议员组成”（四十三条），众参两院的议员以及选民的资格根据法律确定之。但是，不能根据种族、信仰、性别、社会身分、门第、教育、财产或收入的差别来确定（四十四条）。

但是，这样宪法规定逐渐空洞化了。迄今为止可以这样认为，国会正在成为官僚、财界、特定业者乃至一部分选民的政治性受委托机关。虽然考虑特定团体的利害也是发挥政治作用，但只考虑官僚、财界、特定业者、一部分选民的利

益的政治，本来就不是正确的政治。

造成今天这样包办政治的弊病的最大原因，是原有政党的玩忽职守。原有政党为维持和扩大其势力，把自己的党作为特定业者、官僚、财界一部分选民的承包机关，放弃了为大多数群众实现公正的政治的重大职能。自民党有作为保守政党倾向的发挥作用。社会党有作为革新政党倾向的发挥作用。可是，那就不能不使自民党坠落为资本家、地主、官僚的政党，社会党不能不成为工会的附庸。原有政党特别在今天，为培育“经正当选举选进国会的代表”，就必须着手进行党的组织化和现代化。

2. 空虚的“特权阶级”

鲜为人知的国会议事堂

在官僚、工会、宗教、业界、后援会等组织的支持下，经过激烈的选举战而获胜进入国会的国会议员，映入眼帘的国会议事堂的伟容深受感动。作为多数的国会议员是懂得特权的。可是，他们作为“特权阶级”的光景或许有一个月？不久新议员们才知道自己是按党干部的意图进行活动的一个“棋子”，是委托者（官僚、财界、工会、宗教团体、业界、后援会、原籍等）手下的一个小卒，因而大为失望。这期间，成了新议员的打算就是进入国会议事堂，同新议员共同生活看看吧！

“随同父兄初次进入国会”“像幼稚园儿童的新议员”。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总选举结束时，崭新的象章戴在胸前的众院新议员兴高彩烈地进入了国会，其中有的是母亲带着进入国会的自民党议员。这时，用心险恶的宣传，像前面标题那

样，添补了政界闲话栏。如果说众院议员，不管怎么枯瘦，也是能收集数万张票的领导者了。而那个以由母亲陪同进入国会的有趣报道也是合适的。

对众院议员来说最主要的是地盘。只要父亲能保住好的地盘，则儿子就十分有可能成为议员。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七年以及一九六九年的众议院选举中，以“第二代候选人”为别名的“依仗父母势力候选人”能够大批当选的理由是由于这些第二代候选人从其父母那里接受了有力的地盘和地位。

可是，在参议院就不那么简单了。特别是一成为全国区，同没有地盘一样，而是地位和金钱，有时是靠能力。因此，在一九六八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当选的人们也许更恰当的说是“代替母亲陪同进国会的是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有力团体陪同进国会。”

可是，在一九六九年总选举中初次当选的众议员，像作梦一样来到国会议事堂，瞻目而视想不到的雄伟。从一九二〇年一月开工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竣工的国会议事堂的建设费当时货币花了两千七百八十万日元。把这些钱折合成现在的货币约一百三十九亿日元。占地面积七万二千三百五十八平方米，每平方米按廉价10万日元估计需七十二亿三千五百万日元。地皮和建筑物价值总额超过了二百亿日元。假设以一台一百万日元的国产高级轿车计算能卖二万台。

顺便说一下，国会议事堂大约是在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几乎与开设国会同时兴建的。当时的议事堂在现在的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附近，用工程费二十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二日元建筑的，二个月后的二八九一年一月夜失火烧掉了。其后二八九一年二月在同一场所以二十二万九千四百二十四日元低于以前烧掉的议事堂的预算修建了临时的议事堂。

另外的人们不知道的是广岛的临时议事堂。这是我国突入日清战争，“东京是首都易被外敌当成目标。担心较多，‘天皇的国会议事堂’应置于战火之外”因这种议多较多，于是在广岛市基町西练马场内修建了议事堂。一八九四年十月竣工当时的费用是两万五千一百一十四日元，同日比谷公会堂附近修建的议事堂比较哪个简陋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其后，加上一九二五年在日比谷公会堂建立的议事堂统一算起来现在的议事堂是第五个。

四公里的红地毯

现在的国会议事堂的主要走廊铺着红地毯，这个地毯长为四点六四公里。仅从这个就可以想像得到国会议事堂这个建筑物有多么大呀。“选举后，在走廊上如有东张西望的人，可能是新议员，要亲切告诉他们通道。”——国会的事务职员听于部这样指教。

新议员们瞩目的是议事堂内部用豪华的大理石装饰起来的。这些大理石叫日华石、蛇纹石，外面用花岗岩装饰起来的，加起来这些岩石的总量等于三十七万七千九百二十六切，一切（约三十立方厘米，等于一立方尺）一切的堆积起来比富士山还高三十倍的。此外使用的钢筋以直径四分日本长度单位（一分等于十厘 = 3.03公厘）换算等于六千二百二十公里（等于东京到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中央正门的圆柱直径一点八二米，高十三点六四米、重九十二吨，用载重量五吨的汽车运输要七十四台，电气机械、卫生用配管总长度为二百五十三公里（等于东京到滨松市），真是惊人得很哪！

新议员首先希望看的是全体会议会场。参议院在国会议事堂的正面右侧，众议院在左侧。众参两院的全体会议会场不同，参议院全体会议会场，正面的议长席后面有天皇坐的

玉座，众议院则没有。只在国会开幕式的时，天皇通过的议事堂中央正面的重门才被打开，天皇从这里入口踏着红地毯进入二楼的便殿（休息室），从那里经走廊进入参院全体议会会场坐上玉座。走廊附近在开会的前一天开始就加强了警戒体制，一旦天皇来到之际有关的走廊的通行全被禁止。

新议员在“国会参观”的途中“哎呀”，一声歪着脑袋看着在国会议事堂二楼中央大厅的四个台座儿。在中央大厅的四个角落有四个大理石台座儿上立着宪政有功者的铜像，从左边起有板垣退助、大尾重信、伊藤传文……，可是右前方的一角的台座儿上不是铜像。是无主台座儿。

这铜像是作为旧宪法颁布五十周年纪念，于一九三八年制作的，第四个人是谁还没有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有尾崎行雄（号堂）氏的名字，当时“尾崎氏庇护了围绕国家总动员法案诽谤了国体的西尾末广氏（后任民社党常任顾问）”，因而受到强烈非难，“尾崎像”从台座上取消了。

战后虽然也有人主张“尾崎行雄氏的铜像应该建立”，但也有不同意见。“空台座是在参议院一侧，在参议院一侧，用众院议员的尾崎氏的铜像来装饰是不合适的”还有的说：“剩一个人的空席位像征着我国议会政治“未完”，空席的意义深远”。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五年初解决了。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众院大门入口处，由赤堀信平氏（日展审查员）亲手塑造了尾崎氏的胸像。据说一九六九年众院首次当选的众议员一进国会便跑到众院正门，首先向尾崎氏的胸像低头致意。

另外一点，国会周围的“威容”（异容？）也必须加强。一九六〇年安保条约骚动当时的国会周围的道路狭窄，国会议事堂同外边的间壁墙只有按在八十厘米高的石柱上的两根铁管

栅栏。尽管是女学生也可以进去的。

然而，害怕一九七〇年反对安保的游行队伍乱闯进去。一九六〇年安保后的一九六三开始，首先是整理周围的道路，一九六八年三月末首先完成了宽得像迷路似的议事堂周围的道路，各种各样游行队伍难以接近国会，而且好像又容易限制接近国会的游行队伍——以这样的考虑来重新修筑周围的道路。

其次，一九七〇年二月完成了围绕国会的环状栅栏。这个栅栏在六十厘米的基础石上置二米高的铁栅栏，间隔十五厘米。总计高有二点六十米，因为没有可迈腿的地方，随便进入议事堂是不可能的。在众参两院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地上和地下两屋的警官待命所(三百五十平方米)也用了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才完成的，包括前面的铁栅栏、门卫所、警官待命所总费用怎么也得二亿四千万日元。提唱这样庞大的“国会防卫计划”的不用说当然是自民党的议员们。同时，在国会议事堂旁边的首相官邸砖墙上，挂着带红外线的电线。

“暴徒”若是随便跳墙进入首相官邸捣乱，事前能够捕捉得到的。这样以来，首相官邸也好、国会议事堂也好，就成了国民更难以接近的建筑了。

“啊！特权阶级”

“我是工人阶级出身。因此如果说成为国会议员的话，工人阶级的意识不能有任何变化。可是，金像章戴在胸前，给予兰色免费乘车证传乘优待乘生国，每月给予五十余万日元工薪，由此一看，最后仔细想到“议员是特权阶级呀！多么好啊！”这是一九六九年众议院选举中，初次当选的社会党议负流露出的情绪。国会议员是国民的代表，正因为是国政的代理人，才给予多种特权。

在宪法、国会法上明确记载着，议员有不被逮捕的特权、对于发言、表决免受责备的特权。议员在社会上有现行犯罪行为时，在会议期间除有议院的许可是不能被逮捕的。不仅如此，就是在会议期间之前被逮捕的议员，如有其所属议院的要求，会议期间也必须给予释放（国会法三十三条）。这就是所谓不被逮捕的特权。

由于这种特权，战后多少政治家幸免了“灾难”。在一九五八年的昭和电工贪污案件中，对于芦田均、北浦圭太郎、川桥半治郎等人，换查当虽然提出了请求逮捕许可，当时为民主党总裁芦田均氏等以不被逮捕特权为后盾，同检查当局争论，也包括自己在内三人的逮捕许可在众议院运营委员会的场合下审议未结束而不能逮捕。当时的报纸社会版上大写特写“国会议员不讲礼也没办法”的宣传报导。

据有关人员调查，战后，提出要求逮捕的议员在众议院有十件（十五名议员），在参议院有二件（二名议员），被许可逮捕的众议院六件（九名议员）、参议院两件（两名议员）。其中经过两次请求逮捕许可，两次均被议院允许逮捕的“不走运”议员算是创造了记录，那只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大阪出租汽车贪污案中被捕的关谷胜利氏（自民党转入无所属党派，当时的众院内阁委员长）一个人。

与此相反，“幸运”的是佐藤荣作氏（后当首相）。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最高检察厅确定了当时身为自由党干事的佐藤作为造船贪污案件的嫌疑犯，要求允许逮捕的方针。可是，在二十一日，因为犬养法务相对佐藤检察总长发挥了指挥权的权利，连逮捕的请求都未提出。“逮捕的总是小人物”——关谷氏被逮捕时在国会的走廊里嘟囔着这个话，似乎也说出一个真理。

请求逮捕许可一览表

《众议院》

国会	议员名	议院运营委员会		议院总会		备考
		请求	决议 结果	决议	结果	
2	原 信	1948.1.24, 1948.1.25	许可	不审议		昭和电工贪污事件1.30日议员辞职
4	芦 田 均	1948.11.28	审议未完			昭和电工贪污案
	北浦圭太郎	"	"			"
	川桥幸治郎	"	"			"
	芦 田 均	1948.12.1, 1948.12.4	否決	1948.12.12	许可	"
4	北浦圭太郎	"	"			"
	川桥幸治郎	"	"			"
19	田中角荣	1948.12.7, 1948.12.12	许可	1948.12.12	许可	煤矿国营所
	梅田二郎	1951.2.18, 1944.2.23	"	1954.2.23	"	造船贪污案到3月3日期限
	藤田义光	3.30	4.1	"	4.1	陆运贪污案
	关谷胜利	4.7	4.13	"	4.13	造船贪污案
	冈田五郎	"	"	"	"	"
	荒木万寿夫	4.16	4.14	"	4.24	"
	高石幸三郎	1958.6.18	1958.6.30	"	1968.7.1	违反公选法
	关谷胜利	1967.12.13, 1967.12.20	许可	1967.12.22	许可	出租汽车贪污案

《参议院》

19	加藤武雄	1954.4.12	1954.4.14	许可	1954.4.15	许可*	造船贪污案
3	玉屋喜章	1948.11.6	但作为议案未交		1948.11.12	许可*	霸占业务

给委员会

(注) 否* 即不予同意; 许可* 即给予同意。

月薪五十余万日元的吸引力

对平均月收入八万三千九百日元（一九六九年上半年职员收入）的平民来说，一九七〇年二月的今天的国会议员月收入六十万零七千三百八十日元，不真是使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吗？

直到昨天月收入三、四万日元的工会活动家，这些人一戴上十一瓣菊花金徽章，便保证得到三十二万七千三百八十日元，调查研究费十万日元、通信交通费十八万日元，合计共有最低六十万日元的收入。在地方议会中获得最高报酬的是大阪市议会的议员，月薪从二十四万日元，国会议员是其收入的一倍以上。

把国会议员的报酬同各外国比较起来看，美国的参众两院是九十万日元另作别论，英国的下院议员是二十七万三千日元、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十三万二千日元、意大利上下两院议员是二十九万日元，我国国会议员的报酬高居于国民之上可以说是“国际级”若是议长同首相一样是六十五万日元，副议长领五十万日元的报酬。

在战前就有所谓“国会议员日本国有铁路免费乘车令”。成为国会议员就授予叫作“兰色免费乘车证”。用这个乘车证乘坐的是绿色车箱（以前的一等），用于寝事、指定席的情况下，必须有别的车票。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当时属于左派社会党的武藤运十郎议员，当时因为没带指定券而乘坐了特二等（现在的绿色车）引起了列车乘务员的注意。对此武藤氏极力争辩说“你们不认识我吗？”因此，国铁工会方面提出意见说“只是左派社会党的议员武藤氏的态度有问题。”结果，武藤氏因这件事惹了祸，在下次选举中落选了。这件事对议员诸公给予了所谓“马马虎虎乱用议员职权等于害

命”的教训。尤其是，一到周末就用兰色乘车证出去钓鱼的没有经验的议员以前好像也有过两、三次。

此外议员尚有用金钱无法换算的“优越感”。尤其在今天，国会内的红地毯好像谁都可以在上面走，而战前的参观国会者必须在中间的红地毯的左右各四十厘米左右的空石板上走，特别要迈着小步。担当国会记者工作的不允许在走廊的角落里随便走动，院外——议会会场之间常来往，在两院会场的旁边各设两个“记者阶梯”，是螺旋状暗色的升降阶梯。

现在，在国会议事堂和国会议事堂前面的国会议员会馆有一些电梯上装有“议员专用”的牌子，不管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不是议员者绝对不能使用这个电梯。普通电梯满员时，想乘电梯的人只好等待电梯回来再用，而议员专用电梯既使是没有人用也仍旧开着门停在那里，这完全被看做是理所当然。

众参两院各有一个议员食堂，没有议员陪同一般人也是不能进入。国会职员和外部人必须利用在国会议事堂中央一楼，阴暗的“中央食堂”。在众参两院食堂里有圆形彩灯照得通明，而中央食堂里只有暗淡的电灯。把中央食堂称为“人民食堂”。

如果回到办公室被尊重称为“次官先生”的事务次官，在人民食堂的一个角落里一个人清冷的喝着中国汤面。一年生的议员若看到这种光景，挺起胸来一定觉得得意。可是，自民党的故冈岛正兴，社会党的佐佐木更三、川崎宽治、安井长典等各氏同公明党、共产党的议员是人民食堂常客。听说佐佐木更三曾说：“人民食堂便宜，菜谱丰富多彩。”

欢迎！新议员

等待新议员的不仅国会议事堂和上述那样的特权，各党的干部，特别是派系的干部，他们满脸笑容迎入新议员。到处都一样吧。在国会、政党内通行的依然是“数的伦理”，人数多的派系掌握党的领导权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一九六九年众议院选举之后，在争取新议员方面最卖力的是自民党的佐藤派集团。当然啰！有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自民党的总裁公选，佐藤派要尽量争取更多的新议员，原因是必须实现“佐藤四次当选”。那么，佐藤派对新人议员准备了什么样的接收体制呢？当时的佐藤派某干部说过：“大约早就准备好了，当选者的名单决定以后再去劝说，不管怎么说是晚了。什么事情都是先下手为强。我派在立候选人阶段就物色了对象，今后，连准备物色为当选者的对象也搞欢迎会”。

本来不是所有当选的议员都拴在派系上，其中从二、三个派系接受人力和物力的援助的“三得利”（从三个派系领取的意思）“两方取”（从两个派系领取）更有“老取”（得了金钱就隐没了）。国会议员选举后的国会，争取这些精明强干的“三得利”议员和“老取”议员成了中心，自民党各派的争夺战也很厉害。各派干部调查自民党前尾派干部说，对“三方取”议员的资金关系、利权、出生地、职业、姻戚关系等所有方面的关系进行，在这基础上“把新议员五花大绑给绑住了”。

社会党还有稍微漂亮的作法。该党也是在候选人阶段附加派系条件。例如全递工会、全电通工会是江田派、国铁工会是佐佐木派。可是真正的争夺战还是在选举之后，各派以“研究会”的名义争取新议员。“这回我们同志想以新议员为对象召集关于社会主义路线的理想状态研究会，您不想来参加

吗？”嘿！就是这样地进行劝诱。“劝诱员”在选举中，如何向该新议员应援是当然可想而知的了。这样，新议员懂得“各派系是如何需要自己”，多把尾巴翘得老高。

世上没有那么美妙的

可是，议员的世界并不是永远那么美妙。普通的选举要两个月。新议员作为党人，还要作为派系的党羽，一旦有了着落，党和派的干部立刻严加管束。大学体育系虽以甜言蜜语引诱新生入本学系，可是入了本学系以后把新生当成眼中钉，而加以管教。通常惯例的做法不变。自民党田中干事长说：“获得几百万张票有才能的议员最终只不过是政党的一个成员”。

党的干部的管教是从新议员出席全体会议和委员会开始的。如果成了自民党的大人物，常常不出席全体会议和委员会。但是，全体会议和委员会不满规定人数时在野党出来骚扰时，“人头数”也必须凑齐。因此，在新议员参加全体会议、委员会的同时，为请求老议员参加在走廊东奔西跑。同在野党谈判的最基层的联络工作，自民党同各省厅、交涉的最基层工作，也都大体上是新议员的工作。

在一九六九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中出现了大量的年轻的“占光议员”（即二世议员），自民党内也出现了“那么年轻的议员，能参加国会审议吗？”的呼声，厚生省有个干部抨击占光议员欢迎论说：“因为青年议员什么也不懂回去多好啊！”这个官僚敢于肆无忌惮地公开说：“他们是戴金象章的高级搬运工。以所谓议员资格，而且不带多条的主观和利害关系，把情报从右边向左边搬运，这实在是太方便了。”

一到总裁选举或在野党的党代大会开会时，新议员被当

做派系中多数派的工作人员使用。工作人员清楚地贴上特定派系的标签，到处撒钱，虽有说服三方领钱的议员出席特定派系的聚会，但更担心的是“秘密工作人员”。秘密工作人员平时作为“隐者”潜伏在对立派系之中，把对方的情报疏通给出身派系的首领，总裁公选和党大会逼近时，在对抗派系内散布流言蜚语以及各种阴谋诡计，搅乱该派内部不觉悟的成员。还有社会党某青年议员等在其他派系捣乱的过程中，反而被对方拉过去了的谎话。就像有人去找别人回来，结果自己一去不复返了。

就这样，作为党、派系的“过河卒”被利用的大半为新议员遭受到一次幻想的破灭。可是，在其后的选举中，一成为二年生的议员后，作为党和派系的“下士官”可以指挥一年生了，这时才感到议员生活的乐趣。

一切都是“资助者”优先

新议员还有来自原籍选民的严格约束。如赤鹿成为国会议员，想确保其地位的只能是人情。把他们送进国会享国会议员生活的是地方议会议员和团体干部。“为巩固你的选举地盘必须有一百万日元”“某某村的桥没架影响了你的票。由于我帮忙说服宣传是否给二十万日元”——他们就用这样恐吓的话来向议员要钱。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次当选的自民党议员叙述说：“原籍选民若是乘公共汽车进京，还必须管他们饭吃，必须给他们送礼物。对有力的后援者月月必须拿给他们相当多的钱来。就这样的计算像我这样的新议员每个月怎么也得二百万日元。当初，听说国会议员“月给”六十万日元，我想这可太好了，现在看来，我明白了六十万日元是怎样的不值钱”。

因此，多数议员为了补充日常经费的不足，向各种业界

团体的后援者领些钱。官僚出身者主要是从原来出身的省的外围团体讨赞助费等，没有这样团体支持的党人派议员，随便遇到什么医师会、农业团体、中小企业团体、环境卫生团体等便插进去。其中明知道是假团体也成了其中干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个叫日本国际样品市振兴会（本部——大阪市北区榎之上町）面貌不清的团体，当时把以椎名通产相为首的十五名自民党议员连名作为其团体干部，连名声扬出去了。该振兴会的名字好像很正经似的，实际上“打出优良事业所的认定书”从事“承包事业和金融斡旋”弄去了六千到四万五千日元的钱。其中十五名议员之一的一名自民党议员说：“这是很多团体中的少数坏团体。”

椎名通产相等后悔的说：“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列为其中干部，我是不知道的，真是遗憾的很哪！我想我是容易被利用的呀！”像椎名通产相这样老练的议员尚且如此，第一次当选的议员成为这些坏团体的引诱对象是不难想像的，在社会党议员里因为不太谈及这些团体，因为他们委派亲属作不要月薪的秘书等“所得”增加了。此外，从就业斡旋、了解违反交通规则等情况，即使是当选了议员也不搞“事后运动”，下次的选举就变得危险了。

日本国会议事堂其规模和豪华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而且其国会议员也得到了“国际标准”的报酬和特权待遇。可是应该说国会议事堂的“主人公”是国会议员们；只是享受给予他们的特权吗？不！而是要埋头于为派系抗争和利益集团服务的。所谓由政治家来决定的政治正在横行。

在一九六八年的参议院选举中，石原慎太郎（自民党）、青岛幸男、横山敏（都是二院俱乐部）等各种人才进入国会，带来了政治的大众化，对“国会部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也

是事实，可是人才的开拔也不能称善。原理由是加入自民党的
石原氏，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其作为自民党的跑腿仔而已。是
少数派的二院俱乐部中有才能的议员，什么都敢说，什么也
干不了。电视议员在做政治大众化的同时，也使国会本身变得
庸俗不值钱了。国民所期望的既不是密室政治，也不是电视
议员，而是真正的政治家，即所谓政治家风度。

3. 腐蚀国权的最高机关

官僚立法的极盛时期

“众参两院由代表全体国民的被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
尽管宪法是这样规定，但在现实中能够当选的不是代表全体
国民，而都是官僚、工会、业界团体、宗教团体的“附加条
件议员”。而这些附加条件议员、特定团体包办议员懂得国
民议员的特权，尽管满意于一时，不久也知道了作为附加条
件议员、包办议员的局限。在这样的议员们参加的国会里，实
际上能审议什么呢？议员具体的能有些什么作为呢？还有议
会活动的“实力者”即国会里有头有脸的权威人士，即所谓
“议会运营者”能发挥哪些机能呢？探索议员的生活和动态
且看以下的题目。

“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

日本国宪法在第四十一条里是这样规定的。日本的国会
在立法、司法、行政的所谓三权之中是掌握有最强大权能的
立法权这一点连小、中学生也都知道。那么，什么样的法律
经过那些过程被法制化的？

“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因
此，国会议员认为有必要，要亲自制定法案吧！”如有这样

想的人只不过是知道国会的“表面”。国会议员对各省厅干部所制定的“官僚立法”表示赞同或反对都是糊里糊涂的状态，国会堕落成为官僚立法的审查机关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总选举刚结束，就召集了第五十五届特别国会。在这届国会上提出了预算案、法律案、条约案、决议案等总计二百五十二件法案。这里由众参两院的国会议员亲手制定的议员立法只不过是五十六件（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况且，这五十六件中通过的只有六件，只占全部通过一百七十一件的百分之三多些，听到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七官僚立法的说法，谁也不会反对国会**是官僚立法的代行机关**这种看法吧！

继第五十五届特别国会之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了第五十六届临时国会，围绕健康保险等临时特别法案的通过与否，执政党和在野党激烈冲突，以致产生了当时社会党的佐佐木委员长、成田书记长被解职的结果，这是众所周知的。

保健特例法案是厚生省当局为了掩盖医疗保险的财政赤字而提出的法案，该法案目的是以实施被保险人本人负担一部分药费，是作为提高初诊时的一部分费用等为目的。医疗保险财政赤字的原因，除了有患者胡乱就医治疗之外，还有厚生省当局的估计错误，是杜撰的政策等造成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厚生省把自己的错误放在一边，由国民来负担，图谋改善保险财政的。对该法案在野党固然反对，自民党内也有反对者，在“从政府和执政党一体的原则出发，不能反对政府提出的法案”的自民党执行部的说明下，自民党议员在众院劳动委员会强行通过的表决中“充当”了尖兵。多么单纯的自民党议员哪！

社会党领导着中国管经接受于国会。议长特案在委员会上遭到否决，因此，其佐未、川康田两人被授任石井俊彦兼社会党议员委之间，而不得平辞辞职。然后是一九六九年七月的健保国会。一九六七年的国会上，政府、自民党以“健保特例法为二年的定时立法”使其强行通过，到一九六九年“打算撤消”健保特例法的三年定期。一九六七年要让健保特例法这种“恶法”固定化，因此引起在野党轩然大波。在众院全体会议上在野党采取爬行战术加以对抗。对此，小平副议长把“记名投票”改为“起立表决”进行强制通过。在这背后政府和自民党对小平副议长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为此，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四日强行表决的第二天，石井、小平两正副议长为了抗议自民党压力和感到强行表决的责任而辞职。

罪恶深重的是厚生省的健保特例法。可是，围绕官僚立法的这种“闹剧”在国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发生。

过多的委员会

围绕官僚立法的闹剧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委员会审议制度。官僚立法是官厅的课长一级的人直接受了局长、课长的指示起草法案，交给内閣法制局审查。可是，与这样的法制局审查的同时，该省厅同自民党政调会的有关部会进行协商，获得关于向国会提出法案的承诺。想要违反多数党的自民党意思的立法，是没有希望通过的。例如，与厚生省有关系的政调社会部会，与文部省有关系的政调文教部会，都是自民党的有关部会。在这些部会握有权力的，在很多场合是关系官厅出身的老手议员与关系官厅有突出利害关系的议员，一到处理复杂的法案，所谓党人议员等都没有参加同该官厅协商的余地。

这样以来，官僚立法经自民党、内阁法制局审查完了委托给众参两院的有关的常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同官厅数目相对应的被分成十六个（此外尚有六个至七个的特设委员会）。文部省对文教委员会、厚生省对社会劳动委员会、建设省对建设委员会。领导文教委员会或社会劳动委员会审查的自民党理事级人员常常是兼任自民党政调会的文教部会、社会部会的干部，因此，所谓平行的自民党政调文教部会委员同众参两院文教委员不知不觉地就把官僚立法提交给了国会。

那么，普通的议员在国会确定于所属委员会的动机是什么？

“只是不得已呀！”这是真心话。国会法第四十二条有规定：“国会议员至少必须属于一个以上的常任委员会”，每个议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属于按官厅系统种类分成的委员会。若是自民党所属的新议员就更可怜了。他们根据党执行部的命令，毫无权力，被塞进有经验的老议员不喜欢的剩下的二、三个委员会，是“帮腔议员”。

颇无人缘的委员会，如自民党想从这里抽手不干，立即会引起来自在野党方面的定数不足的指责，而遭到拒绝审议。因此，新议员把这些委员会有几个都兼任起来，驱逐所属议员，亲自当了“走廊说客”，让他们充当委员会审议的牵线人。

英国的委员会制度笼统地被分类成A、B、C、D等四个种类，不论是议员立法、官僚立法，按提出的顺序机械地委托给各委员会。因而，全体议员都能知道法案的内容，好像能阻止官僚出身议员和有利害关系议员的专横拔护。

可是，我国的情况，一般议员同非官僚出身议员以及有

利害关系议员之间也颇有大的意见分歧。结果，普通的一般议员对委员会的审议敷衍了事，只热忠于自己的选举活动。当然，在热忠于选举活动之余，尽管是委员会审议所谓不起劲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况且，选举临近时，如要进入选举战，就必须进行拼命的选举运动，选举之后，由于难以忍受的“繁重任务”而一定有一些“牺牲者”出现。（参见四四页）。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总选举后的六月，社会党的“爆炸式人物”横路节雄氏因心肌梗塞突然死亡。因此，当时江田三郎氏窥视议员宿舍横路氏的房间而大惊失色。表面上看，是那么健康的横路氏，屋子里却到处都是心脏病的药瓶子。人们不知道横路氏患心脏病的苦恼。即便原籍人们知道议员心脏衰弱，那也不知会在下次选举中会造什么谣言，横路氏也未把心脏病的秘密告诉其他人知道。

成了无用的议院全体会议

因为连某委员会的所属委员尚且不清楚的官僚立法被提交全体会议，与该委员会无关系的议员就更不会知道要提交全体会议的法案的内容。为此各党在全体会议之前先召开议员会或议员全体会议，听取党的干部下指示：“我党议员对某某法案赞成，对某某条约案反对”等。就这种各派议员在全体会议上根据上述指示胡乱进行赞成或反对的投票，弄错了指示投了相反的票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而且，在全体会议上的议员“无礼貌”是常有的。耳语、打瞌睡等就更不用说了。根据两议院规定，严禁将周刊杂志携入，他们也不以为然。冈山县出身的青年议员（自民党）等甚至在全体会议会场上公然搞起了签名运动。

“议长不走出会场，议员是不能退席的，”连这些西欧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以后死去的国会议员

姓名	年龄	死亡年月日	病名
高崎达之助	79	64.3.24	急性心脏衰弱
松浦东介	56	64.3.6	肝硬化
堤康次郎	75	64.4.26	心肌梗塞
大野伴睦	73	64.5.29	"
寺岛隆太郎	52	64.7.31	急性肺炎
山村新治郎	56	64.10.2	直肠癌
渡边良夫	59	64.11.4	心肌性不全
三田村武夫	65	64.11.24	胃癌
加藤精三	64	65.5.3	心脏麻痹
河野一郎	67	65.7.8	腹部大动脉瘤出血
椎熊三郎	70	65.7.27	胃癌
高桥等	62	65.8.10	肝硬化
池田勇人	65	65.8.13	食道癌
久保田丰	60	65.10.24	心脏麻痹
河上丈太郎	76	65.12.3	蜘蛛膜下出血
青木正	67	66.4.12	肺癌
中村幸八	67	66.11.18	前列腺肿瘤
唐泽俊树	76	67.3.14	心肌梗死
横路节雄	56	67.6.14	"
清濑一郎	82	67.6.27	急性肺炎
东海林稔	63	67.10.1	交通事故
岛口重次郎	55	68.3.17	肝癌
伊藤隆治	69	68.3.28	糖尿病
小泽佐重喜	69	68.5.8	"
纲岛正兴	77	68.5.28	心不全
森清	52	68.6.19	高血压，尿毒症
马场元治	65	68.6.23	肝硬化
山崎巖	73	68.6.26	心肌梗死
梶俊二郎	65	68.7.12	胃癌
川上贯一	79	68.9.12	心肌梗死
坂田英一	70	68.7.22	心机能不全，急性肺炎
小泉纯也	63	69.8.10	肺癌
正力松太郎	82	69.10.9	冠不全

会上的常识性众议院规则也都不予遵守。全体会议将要散会时，一般议员就像竞技场或剧场的观众一样争先恐后地拥向出口，从讲坛上向会场行散会礼的议长，正好成了向议员的背后行鞠躬礼的局面。

为此，石井原众院议长召集各党干事长和书记长提出要求说：“为了提高议会的权威，要遵守议院的规则，希望不要对议长表示不礼貌的态度”。对议长的要求，各党首脑虽然表示响应：“要立即马上向党内彻底贯彻议长的要求”，可是到后来，船田众院议长仍旧是向议员的背后行鞠躬礼。尤其是对当时石井议长的要求，佐藤派的干部顺口说出：“托了首长（佐藤首相）的福才当上了议长，可是石井好像了不起似的”。因此议员在会场内的“无礼”现象丝毫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出席全体会议的议员也未增加。例如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第五十五届特别国会的众议院擅自缺席者竟达到一百八十一人，加上申报缺席者三十八人，请假许可者十一人，延期申请者一人，总共缺席二百三十一人，众院议员总数为四百八十六人，近半数未出席全体会议。而且，这是全体会议上未立名牌的人数，而立了名牌的依然不知到哪儿喝酒去了的议员也必然有十人或十五人。

议员出席委员会和全体会议的状况在接近解散议会、大选的时候就越来越糟糕了。

一九六九年春天，自民党首脑把解散国会作为牵制不愿解散的社会党作为手段煽起了解散风，各党议员慌忙奔向选举区。从国会休会期满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到五月九日为止众院全体会议开了三十次，自民党（当时有二百七十五个议席）全部出席的有田中干事长、园田国会对策委员

长、久野议会运营委员长等以干部为中心的只有二十四人。以下出席二十九次~二十六次的有八十七人，二十五次~二十一次的有九十人，二十次到十六次的有四十七人。其中三十次全部缺席的有井村重雄、坂田英一两个“猛将”。当然这两个人有因病疗养的理由。总而言之特别是选举对各位议员来说是最关心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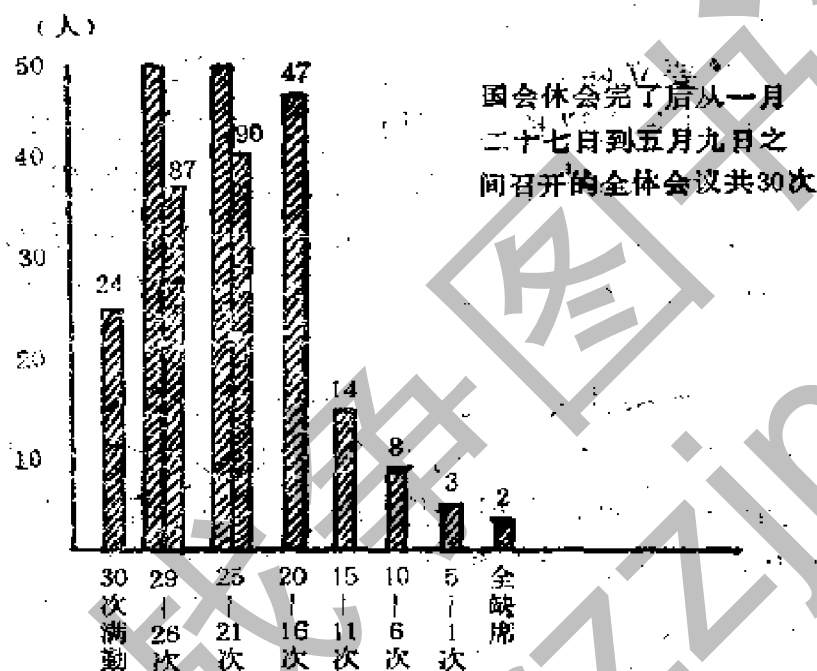


图3 自民党众议院议员275人的全体会议出席比较表 (1989年)

参加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出席率不好的议员对于发表出席情况神经过敏。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间，宣传部门发表了议员出席委员会和全体会议的出席率，进行了议员的勤务评定，因此，一部分议员以超党派联合向国会事务当局施加压力，采取禁止发表出席率的措施。前面的第五十五届特别国会、第六十一届通常国会议员出席状况，实际上也是事务当局完全秘密整理的资料。

连时间也能停止的议员族

——日本国会的怪事件

对于此例，对议员本身来说尽管想作“正义”的发言，但国会方面却往往认为“是不适当的发言”而加以惩罚。一九六八年四月，社会党的惠积七郎氏（众院议员）在关于归还冲绳的质问中，称佐藤首相为“卖国者”，结果受到停止三十天禁止进国会的惩罚是其很好例子。国会议员的惩罚迄今为止在众议院有七十一件，在参议院有二十八件，给予停止三十天进国会是仅次于开除的重罚，这是一九五四年警察法骚动以来开始的惩罚。社会党方面极为愤慨的说：“尽管自民党占多数，但这种做法是卑鄙的。”

现在的国会是一种独特的世界。因此，从社会上一般常识来看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像的事情却在国会颇为多见。其典型是使时间停止的离奇怪事。关于有的议案因在野党始终反对，给国政带来重大影响——这是执政党的判断，于是，按事务总长的命令，使各议院管理部的大时钟停止前进。

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在贵族院审议制定新宪法遇到卡壳时，各种修正案从各委员会被提出来了，同一天的审议未结束，六日午前零点前五分钟时，贵族院的钟停止了。就这样宪法于五日中在国会顺利通过，贵族院的时钟若在六日午前零点，外面已亮天了，竟然出现了这种怪现象。

国会的怪事件

螃蟹横行事件：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第二次通常国会开幕式上，副议长故松本治一郎（社会党），说成是“讨厌螃蟹横行”把在天皇面前横走以后致辞，因此被称为螃蟹横行事件遭到否绝，后发展成为大问题。

号铃事件：

在议长席桌的左上方有铜铃。这是在会场吵闹时由议长摇铃使之肃静，被视为神圣的号铃。可是在一九六五年的日韩国会上，社会党议员有马辉武氏（落选中）在爬行战术旁边摇铃而造成大骚动，受到了惩罚。

马拉松演说：

高津正道氏（社会党），对故清濑一郎议长的不信任决议案，为说明原因原定用六个小时讲不完。最后只讲了一个小时。一九五四年加藤勘十、一九五六年下川仪太郎（均为社会党）都想长时间演说，结果未能完成。

近来，像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的生方大吉氏（民主党）那样在会场内向痰盂内撒尿的不懂常识的议员没有了。但是，所谓爬行战术、咯嗒（强行通过）、交易等不可思议的“国会语录”依然存在。

“议运族”的“首领”

议院运营委员会是常任委员会之一。通称“议运”，称其委员为“议运族”。议运的任务顾名思义，有关议会的运营的所有事务都处理，因此像一般常任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审议官僚立法之类曾次低的工作是不做的。

那么具体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之间，把哪个委员会的什么样的法案在什么时候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具有决定这些重大事情的任务。这对一般国民来说，也许是不明白，可是，对于把行政立法活动当做终年的活动的各省厅来说，议会运营委员会实在是令人论厌。

例如，厚生省在一九六九年七月把健康保险特例法案提

交到国会，当时的樺本保险局长拼命要该法案在国会通过。原因是樺官僚的省内威信往往是由自己所管理的法案在国会通过的多少来决定其威信高低。

由于该法案的强行通过可以看出，想些办法总会让国会通过的，所谓像日韩条约案件，学校教育法修正案等带有强烈政治性的条约案件、法案等国会能不能通过，可以说完全是由议运委员来斟酌的。

假设自民党的文教部会的委员要使学校教育法修正案在国会的文教委员会上通过，要在朝鲜人的学校里禁止反日教育，自民党的议运委员要阻挠的话，就可能在全体会议上否决。尽管在起初的委员会阶段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致通过的法案到了全体会议阶段时，只要议运委员的“乱心情”不好了，来自执政党在野党议运委员的干涉，而终于否定了法案的例子也有过几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众院议会运营委员会为了调查有关自民党（当时）关谷胜利议员的大阪出租汽车贪污事件国会的许诺逮捕问题而召开了赤间法相、川井理事长。可是，这时自民党委员都以“赤间法相的态度不明朗”而批评法相。在在野党委员的攻击面前为赤间法相的立场辩护的理应是执政党，自民党委员的“事情”。可是，一成了“议运族”，有时和在野党一起超越了党派，变成了具有同是一家的意识。

因此，称为“议运族”，对议会运营委员来说是一种“高尚荣誉”象征同族意识的固有名词，对一般议员来说有一种“讨厌”包含一种蔑视的语言。

议运委员会的第二项工作是处理有关议员周围的一切“庶务”。

发生了纠纷的讲演观察

其一是在全体会议上讲演者的选拔。属于像社会党那样没有权力政党的议员，在原籍“有声望”的人，才能在全体会议的讲坛上发言。因为在全体会议上重要的质问和演说，必然要通过电视和报纸等宣传工具，向选举区传达，该议员可以不花一文钱进行选举运动。在第五十八届通常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的讲演者，有百分之九十在六月被改选的议员，看到这种情况便可知道议员在讲坛上讲演的效用。

一九六九年一月围绕在重开国会上讲演的顺序执政党与在野党各派的斗争，只能令人“发笑”。首先是佐藤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紧接一连串的政策演说进行之后，于同月的二十九、三十两日，各党代表进行质问。成为惯例的代表质问顺序是“第一天是社会党、自民党，第二天是社会党、社会党、民社党、公明党、共产党”依次进行。可是在这中间民社、公明两党提出异议。主张：“在多党化的国会中，社会党的势力正在相对下降。而且各在野党的首脑应按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公明党的顺序进行”，结果自民党赞同了民社、公明两党的妥协案，在议运委排除了社会党议员的反对，强行通过了“第一天是社会党、自民党、社会党、社会党，第二天是民社党、公明党、共产党”的顺序。因此，全体会议开迟了，第一个质问者是成田社会党委员长站在讲台上已是三十日零点二十分钟。这样以来到休会为止的国会成了从深夜开始的国会，在深更半夜的国会上出现了党的首脑代表质问的异常事态。各党首脑都想在电视广播时间里站在讲台上讲演。结果社会党在自民、民社、公明三党联合战线面前败退了，在电视观众就寝的时间进行代表质问，从而陷入窘境。

称为海外视察的愉快渡假

选拔海外视察者也是议运委员的主要任务。海外视察是靠国家花钱去“游山玩水”，为了能在选举公报上登出“海外视察几次”取得该“资格”，对一般议员来说一定想要加入视察团的。每年夏天，国会闭会后的视察季节一到，目光敏锐的议员经常跑到本党议员族那里去，极尽拍马迎逢之能事。可是在总选举前的一九六九年夏天，确实是希望去海外视察的人减少了。

附带说一下，海外视察最兴旺的一九六七年夏天，去海外视察的成员如下（仅是众议院）：

八月二十五日出发的众议院各国议会同盟评议员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代表团——小平久雄（自民党）

八月二十七日出发的众议院各国议会制度调查视察议员团——伊能繁次郎（自民党）外有四人。

八月二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出发的众议院冲绳派遣议员团——臼井庄一（自民党）另外有八人。

八月二十九日出发的众议院各国议会同盟地区会议调查议员团——荒船清十郎（自民党，团长）外有六人。

九月五日出发的众议院东南亚视察议员团——高桥英长（自民党，团长）外有五人。

九月七日——九月二十日，众议院访法亲善议员团——福永一臣（自民党）外有九人。

在一九六七年的国会休会期间仅海外视察的议员实际是三十八人，此外把每个月有一、二个人经常地短期海外视察的议员加进去，光是众议院一年就有五十人用国库费用进行海外视察。

当然，以上自称海外视察的人，回国后写个几十页的报告书交给议运委和议长。可是详细的报告书是同行的众议院

或参议院事务当局人员整理的，甚至视察团员不知道的事情也给写进去了，这样事情屡屡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的。除重要的议员外，是以外国的政情调查为名，常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常出入一些令人纳闷儿的地方，大概同一些与政情视察无关的人进行交往。其中也有的议员从访问过的苏联一个劲地往原籍寄明信片，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上“咕一、咕一”打招呼，因此，也有的议员从苏联带回个“达瓦利希（同志）打瞌睡”的绰号。特别是迎接国会议员的日本在外国使馆的人员更是不得了。不管怎么说，对方是“母国”的议员先生，马马虎虎的冷淡接待可不得了。像偶然发现了什么重要公务似的，也像向导姑娘一样充当向导员陪同议员在市内参观实在难以忍受。

被腐蚀的最高机关

可是，最近常用国会的权威，这个词汇，再没有比下面的两个“意外”的事实更使国会丧失权威。

第一是废除虚礼问题。

国会从一九六四年第十二届国会以来，每年搞两次“关于废除虚礼的协商”。最近也搞了“议员歌曲以自慎”（一九六六年六月）“禁止暑期发送明信片以及收授物品”（一九六七年六月）等协商。特别是一九六九年六月的公约要求各党干事长、书记长严格遵守，有“违反者给处罚”的严厉规定。

可是，第六十一届通常国会结束时，各议员有约在先也不以为然，还是向原籍发送了大量的明信片、物品。国会议事堂旁边的国会邮局等，空前的忙碌，职员们实在有些受不了。因此于一九六九年同“违反废除虚礼协议”而受到处罚者同往年一样连一个人也没有，那也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连

公约文件的起草负责人某说运委员长对向原籍和与选举者发送交换的礼品也是无可奈何的。

曾有这样例子。一九五四年才二月的第一次协商后不久，日本民主党的山本正一氏（众院议员，后任镰仓市长）因期待总选举而向原籍发送了大量的如同下列的演说辞。

我们忧国之士为使腐朽的国政一新，纯洁政党，振兴大产业，带着光明的希望要确立能够和平和繁荣的生活的政治而结成新党。山本正一君作为我的秘书日夜勤奋，为使我党会计清明作为党的经理局长长期间进行着精力充沛的活动。山本君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无法取代的宝贵人物，请你们给山本君以巨大的支援。

日本民主党总裁

鸠山一郎

山本氏当时借首相鸠山一郎的推荐书的名义，巧妙地进行了事前的运动。可是，这个推荐书，被同一选举区的土井直作氏（社会党）提交给国会，山本氏也终于被迫辞掉议员职务。

看来这已经是老话题了。不管怎么说，因为协商每年还在搞两次，具体承担责任者前后总共，只有由本氏一个人。

议员会馆是降妖殿吗？

使国会丧失权威的第二个意外的事实是国会议员会馆不光明正大的使用。

在国会议事堂里有并排三栋七层高楼大厦。从议事堂向左是第一议员会馆，向右是第二、第三议员会馆。该议员会馆是为选入国会的议员每人一个房间。总建筑费（相当于一栋）八亿多日元，是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建筑的。该会馆同国会议事堂相互之间着大隧道相连，在会馆的地下有大

停车场、剑道和柔道场、卖店、会议室、食堂等合理的设施。

可是，该会馆实在是不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被使用。即在所谓“为议员的议会活动方便”的目的以外，乱用议员会馆的议员是有的。

一进某国会议员的房间，左面是旅行提包，右面是百货商店的包裹，狭窄的地方堆积很高。该议员是广岛县出身的自民党议员N氏，因对原籍选民关照而有名。让选民从原地定期进京，首先是在议员会馆的房间里保管行李，游览东京市容之后，然后让带上从百货商店定期买来的礼物，送他们回去。这礼物是被分成男女老少的，实在是细心的分别赠送。

如果不这样就不会取得选民的欢心，选举也就不能胜利吧！然而，这样的收买活动助长了费钱的政治。分析造成黑雾的原因时，认为议员会馆“变成了行李寄存处”“变成了赠送礼物窗口”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必须禁止的。

更为恶劣的是把会馆的自己房间变成了同各行业联系的前线基地。

国会议员会馆每年有一百多万人的外来者。尤其是住着“大人物”的第一议员会馆，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一年间，有多至五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人的外人来访者，而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就增加到六十六万人。

来访者的种类大体有官吏、工商业者、学生、陈情团、工会有关者等等。其中访问自民党议员室的工商业者中，有与特定的利权相勾结的人。而且，把议员会馆的房间作为“政治密室”加以利用，进行利权和金钱的交易。

第一议员会馆外人出入者

1968年 11月	46,752人	1969年 6月	64,739人
12月	77,384	7	68,434
1969年 1月	58,207	8	37,429
2月	57,693	9	38,209
3月	58,777	10	43,643
4月	54,672		
5月	54,105		

因此，特定政治家同工商业者之间的“黑雾”公开化的地方则议员会馆便成了搜查的对象。田中织之进恐吓事件（一九六五年）、田中彰治事件（一九六六年）搜查重政之后援会、关谷事件（均为一九六七年）中，司法当局的手伸进了议员会馆内。可是，像这样司法当局的手伸进议员会馆的情况，从议员会馆的乱用者总数来看，是极有限的。

国会事务当局有个服务员说：“实际上有更多的人进行‘交易’，把议员会馆房间作为自己后援会事务所支部，作为政治资金集团事务所的议员也有。可是，因为国会事务当局对议员室的利用状况无权进行具体调查，其实际情况完全不清楚！议员如想滥用，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得上”。该服务给予国会议员会馆的“降妖殿说”是未必能够否定的。

国会为谁而存在

以上，从各方面介绍了国会鲜为人知的实态。这就明确了日本的国会没有什么权威，是由日本政府带头行事的。那么要提高国会的权威，使其发挥本来的机能，当前应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第一恢复立法机关的自主性。

在第五十五届国会上提出了二百五十二项法案、条约案，其中出自议员之手的只有五十六项，而且像年薪提高法案，在外财产基金法案、劝业基金法案等，具有明显地本位主义内容和选举区意识。在第六十一届国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八月）通过的八十二项法案中，议员独立立法色彩较浓的法案只有四项。所谓“让官僚为家乡立法，让议员为选区和自己立法，这种分工进行得很巧妙，在这里国会议员的继续地盘下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众、参两院各自有近八十人的法制局员，帮助国会议员的立法活动。尽管如此，也没有完全用上。这些法制局员实在是浪费。

在第六十一届国会上法案条约案

	提出项数	通过项数
内阁提出法案	113项	63项
议员提出	众院	4项
	参院	0
条约案	16项	12项
继续法案	6项	3项

第二是改善党及议员的体质。议员的立法活动不能专心致志，其结果应归咎于日常选举活动过于繁忙。为了选举，同一个党的人也必须进行争夺同一党的党员，也因选举而提出不同的政治路线结成派系。这样提出的是党的政策，还不能立法化。因此，政党由于取消派系实现现代化和选举制度的合理化也实属必要。

与此相关连的是要打破议员的特权思想也是不能忽视的。作为主权者的国民要到国会去参观时，首先被引进阴暗狭窄的地下室。在那里傍听者像罪犯一样受到严格的身体检

查，然后才能被领进全体会议的会场。而且在全体会议会场上不能带笔记本之类的东西。

一方面，国会议员从向阳的国会正面昂首阔步地走进来，大摇大摆的走在红地毯上。然后在全体会议会场里打开周刊杂志，打起盹来。还有在国会议员会馆的电梯上为外来者乘用的电梯总是拥挤不堪。在外来者用的电梯旁边是议员专用电梯，在这里总是空空如也。而另一方面，尽管外来者与国会有关者有急事想用议员专用电梯，则电梯小姐立即关上门不让进去使用。

还有，国会议员全都从国铁那里领取免费乘车证。可是，国会议员也把这个免费乘车证挪用于与议员工作无关的事情利用它去游山玩水。

国会议员一开口便是强调自己是不分党派的国民公仆。可是，像冷淡对待一般国民的那样具有特权也满不在乎的人结果怎么样了呢？在一九六九年大选中社会党的惨败，就是在大模大样坐享议员特权的同时，同自民党狂热的交易，是选民对忘记了作为社会主义者议员的使命感的“保守的社会党候选人”完全不理睬所带来的恶果。最好是希望社会党议员进行反省。这种特权思想在革新政党的议员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第三是对少数人意见的尊重。自民党自从一九六一年以来独占众议院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在野党每当有机会就提出“应给分配委员长的席位”的要求，结果都被拒绝了。议长不用说了，副议长的职位也同样是从一九六一年以来一直被自民党所占据。按照议席给予发言的机会，进行权利分配，这是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不遵守这种基本原则的自民党，结果把议长、副议长、常任委员长当做无权威的职

位，造成了使国会审议混乱的原因。

4. 自掘坟墓的强行表决

成了展览品的预算委员会审议

战后的国会要摆脱由于执政党的强行表决和在野党对此进行的机械性的抵抗及由此产生的混乱，把它说成是历史是不可能的。执政党确信可以强行表决，可以举出“自民党在选举（国会）中获得的超过半数国民的支持，从多数决定原理来说，自民党的行为是正确的”。在野党认为机械性抵抗是“除了对无视少数人意见的执政党进行机械性抵抗之外没有别的手段”。特别是像现在这样自民党依靠多数强行表决，使对国民的议会民主制不信任越积越多，执政党自己给自己带来了破坏议会民主制的结果。现在的自民党对此连一点认识都没有，这就成问题了。

由议长、副议长等的选举，组成的议院机构一完成，从法案进入实质性审议开始，政府、执政党同在野党的对立，国会混乱的情况被分成两种情况。第一是众所周知的执政党不等待质问结束就要求强行表决，从而带来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肉体冲突；第二是不进行肉体冲突而出现所谓“空白国会”的事态。

空白国会恰当地说一定是以众、参两院的预算委员会为午台发生的。在野党在预算委员会审议之际，派出所谓能言善辩口齿清楚的“预算人”充当党的主角，通过言论向国民宣传在野党的主张。特别是日本广播协会把预算委员会的总结质问用电视进行实况广播，由此看来，预算委员会的审议是一种“展览品”。因此，在野党在预算委员会的会场上进行肉

体的机械抵抗不太搞了。另一方面执政党方面也不搞在通过手续上复杂的政府关系预算案的强行表决。预算的通过如果推迟，也可搞成临时预算，预算案强行表决的情况下，必须有决心解放国会。因此由于在野党的质问，使政府张口结舌无言以对，难以答辩，或者答辩中发现牛头不对马咀，就拒绝审议——于是就造成了所谓空白国会的现象。

众所周知的空白国会的典型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的通常国会上，围绕“仓石发言”发生的。众院预算委员会在第四十次国会以后到第五十次特别国会之间，出现了十三次空白，第四十二次国会长达五天之久。可是，在野党使在第五十八次国会上仓石发言的大幅度刷新了空白国会的记录员

国会混乱事例

法案名称	时间	国会次数
破防法	1952年 6月	第十三届通常国会
新警察法	1954年 6月	第十九届通常国会
小选举区法案	1956年 5月	第二十四届通常国会
新教育委员会法	1956年 6月	第二十四届通常国会
进行规制法续存决议	1956年11月	第二十五届临时国会
警职法案	1958年11月	第三十届临时国会
越来赔偿	1959年11月	第三十三届临时国会
修定安保条约	1960年 5月	第三十四届通常国会
政防法案	1961年 6月	第三十八届通常国会
修正失对法	1963年6月—7月	第四十三届通常国会
农地报偿法	1965年 5月	第四十八届通常国会
日韩条约批准案	1965年11月	第五十届临时国会
修正国民庆祝日法	1966年 6月	第五十一届通常国会
“黑雾”单独国会	1966年11月	第五十三届临时国会
健保国会	1967年 8月	第五十六届临时国会
“仓石”国会	1968年 2月	第五十八届通常国会
大学·健保国会	1969年7月—8月	第六十一届通常国会

预算委员会审议中断事由一览表（第四十届国会以后）

国会届次	审议案件	中断了的日期	中断期间	中断的时期	中断的事由
第40届（常会）	1961年度补充预算	1962年2月8—9日	2天	补充的质问中	田中角荣的发言问题
第42届	1962年度总预算	1962.2.10	1天	"	总理感冒的原因因会议流产
	1962年度补充预算	1962.12.13—17	5天	"	全体会议和预算委答弁不合
	1962年度补充预算	1963.3.1	1天	结束之前	围绕大平外相不信任任决议案逆文
	1963年度总预算	1965.2.2—3	2日午后	总结质问中	农业用汽油税减税问题
第48届（常会）	1965年度总预算	1965.2.2—3	3日午前	同	医疗费问题
	1965年度总预算	1965.2.6	半天	"	"
	1965年度总预算	1965.2.10—	1天半	"	“三矢研究”所
第51届（常会）	1965年度补充预算	1965.3.3—	半天	结束之前	"
	1965年度补充预算	1966年.2.15	半天	一般质问中	固定资产税问题
	1966年度总预算	1966.2.18	半天	补充后一般质问前	"
	1966年度总预算	1966.3.21	半天	分科会之后	"
第55届（特别）	1967年度临时预算	1967.3.21—25	1天半	总结质问中	关于自民党国对费矢野发言问题
	1967年度总预算				
第58届（常会）	1968年度总预算	1968.2.7—22	16天	"	围绕“仓石发言”
	1969年度总预算	1969.2.17—18		"	围绕召回下田驻美大使
第61届（常会）	1969年度总预算	1969.3.1		"	"

同时使仓石农相被迫辞职。当时的社会党柳田国会对策委员长含着眼泪激动地说这是“空前的快举”。

院外的臭气也加进来的破防法骚动

可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花样”是行使肉体的乱斗吧！乱斗国会的开端是一九五二年的破防法骚动。当时的第三次吉田内阁（自由党）把通过破坏活动防止法作为对在野党，特别是左派社会党进行牵制的手段，从而导致解散众议院。在这中间当然遭到左右两派社会党的反对，因此被送到参议院审议，在全体会议阶段搁浅了，于是迎来了六月二十八日的国会乱斗。

可是同日午前的参议院全体会议的开会中，会场内笼罩着异常的臭气，执政党和在野党都骚动起来了，曾休息了一段。执政党议员猜疑说是“社会党方面撤了毒瓦斯”，社会党方面也怀疑：“这是要把在野党排除会场的阴谋”。为此，在午后重新开始的全体会议上，江田三郎（左派社会党）就臭气的原因提出了要求调查报告的质问，对此佐藤尚武议长以奇妙的脸色答辩说：“臭气的原因是垃圾场的垃圾因连日下雨腐败了，由于换气装置把外面的臭气送进来了”。在场的执政党在野党议员都捧腹大笑起来了。

可是，执政党在野党议员正在哄笑期间。小林英三（自由党）要求首先审议破防法的议题，因为议长采用了这个意见，引起了讲坛附近的大混乱。挤上事务总长席位的栗山良夫（左派社会党）、水桥藤作（劳农党）两氏从阶梯上跌倒而受了伤。

一九五四年在第十九届通常国会上新警察法骚动中，在野党的妇女议员“大出风头”是闻所未闻的。以向国家警察一体化为目标的新警察法于二月十五日被提交众院审议，虽

然三个月后的五月十五日总算在众议院通过了。但在参议院阶段再次搁浅了，会期也快结束了。因此，堤众院议长为了第四次延长会期于六月三日午后十时三十五分奔赴全体会议会场。可是，各妇女议员们抢先坐进了首要席位，坐在议长席上的是堤鹤代，坐在事务总长席上的是山口静江，坐总理大臣席的是户叶里子（以上都是社会党右派，坐副总理大臣席的是福田昌子（左派社会党），入口处有左右两社会党的纠查队警戒。因此，自由党议员互相挽臂进入会场，想从后门进入会场的堤议长回一趟议长室，同日午后十一时四十五分，这次是借助于警官队进入会场。当时混乱的情形在次日《朝日新闻》上有如下报道。

“十一点四十五分，围绕议长的入场就乱成一团了。在更加激烈的乱斗中，国会警卫员的帽子也飞了。十一点四十八分，入口的门半扉开着。人群发出哎唷哎唷的吆喝声，乱成一团不断往里挤。在议长席的周围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和国会卫士拥挤不堪。十一点五十三分，警察队终于入场了，出现了与激怒的社会党议员之间的大混战。”

当时各报纸刊载了在讲台中央穿着洁白服装的堤鹤代和在事务总长席上差点被挤死的山口静江氏的照片，把女议员的“出风头”传开了。当时的山口静江氏现在也改换到自民党门下有今昔之感。

被警官保护着的审议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成立的鸠山内阁，到一年半以后的一九五六年六月，新教育委员会法案企图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可是，参议院社会党比众议院反抗的更激烈。原因是，新教育委员会法案把公众选举制的教育委员修改成为知事、市町村长的任命制，日教组出身者多的参议院社会党不得不“豁出

命来干”的反对“教育的中央集权化目标”。

可是，在控制了六月三日会期末的自民党内出现了“无论如何都应该通过”的议论，六月二日午前二点五十分，松野鹤平议长决心动用国会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向根本内阁官房长官发出指示，接到这个指示的根本长官立即向警视厅要求出动警官，分乘八台卡车的警视厅警备队的警察官约五百人从樱田门方面上坡，午前三时许到达议院内。就这样，五百名警察官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会场门口待命，会场内的社会党议员一骚动，松野议长仅命令二十名警官进入会场保护讲台周围，要求文教委员长做报告。这时，社会党的龟田得治、冈三郎、松浦清一、清沢俊英同台上的警官互相拥挤乱成一团，松野议长因此向这些人提出起诉。

这样以来，第二十四届国会在国会史上留下了两个污点。一个是参议院会场内首次引进了警察队。另一个是松野氏提出起诉，一九六六年一月东京地区法院下达了所谓“裁判权达到国会内”的判决。

取消审议的修改安保

一九六〇年因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而称为“安保国会”的混乱，其规模和影响是空前未有的。宣传机关担心在一九七〇年再次定期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左右两派大决战”，也是因为一九六〇年留下了犹新的记忆。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政府、自民党召开了以岸信介首相、大野伴睦副总裁、川岛正次郎干事长、福永健司国会对策委员长、小泽辰男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长等为中心的首脑会议，关于日美安保条约案件的处理问题取得协议的结果，决定了尽可能在十九日内结束在特别委员会质询的方针。

可是，一到第二天即十九日，政府、自民党以“国会审

议随便强制是不理想的”为理由，匆匆忙忙提出把国会延长五十天到七月十五日的想法，通知了清濑众院议长。这是因为：①社会党得到院外的援助，决心要永远阻挠修改安保；②自民党内的河野、三木、松村等反主流派批判强制的国会审议——因此，在十九日白天为记者招待会上川岛干事长也表明：“十九日内委员会质问不结束”。

可是，从口是心非这一点上看到了川岛干事长的真面目。小泽委员长于十点二十五分，突然召开一直在休息中的特别委员会，仅用三分的质问就结束，进行了强行表决。这在委员会室里当然引起了大混乱。

可是，在特别委员会质问结束，好像等待表决的清濑议长要求警察队出动，五百名警察于同日十一时许，把拥至议长室门前的社会党议员，秘书团等左一个右一个地全都架走了，十一点四十七分保护议长进入全体会议会场。在议长室门前社会党同警官队的搏斗中社会党的足鹿觉（一时不醒人事）、下平正一（腹部内出血）、阿部五郎（右眼出血）、柏正男（左眼出血）各氏所受的伤要数资料的严重，可想而知哪两个人的搏斗都是很激烈的。

就这样众议院全体会议于午后十一点五十分，由自民党单独决定立即延长会期五十天。十多分钟以后的二十日午前零时六分，清濑议长宣布重开全体会议，要求小泽委员长做报告，安保条约的修改由自民党单独通过被承认。顺便说一下，反对自民党执行部的强制做法的河野一郎、三木武夫、松村谦三等各氏这时已经回家了。自民党执行部的这种做法是违反民主原则的。特别是三木氏等当时的抵抗，产生相反后果，每当有事时，佐藤派就把当时的“老把柄”摆出来，至今仍为其弁解。

高涨起来的院外游行

一方面，听到了“安保条约案件被强行通过”的报道，阻止修定安保国民会议的工会成员，全学联学生、新剧演员们从二十日早晨陆续拥向国会，到午后二时许就膨胀到十万人。特别是全学联主流派七千人（警察厅调查）在二十日夜拥进首相官邸，同警察搏斗，学生和警察共计负伤者五十一人。

到了二十一日，国会周围的请愿游行更多起来，傍晚有十五万工会会员在包围国会的同时，拥向涩谷与平台岸信介首相官邸的也有三万人。

就这样，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之前，作为先行官的总统新闻秘书哈格蒂等二十三人于六月十日到达羽田机场，迎来了院外斗争的“第二个高潮”。十日午后三时三十五分到达羽田机场的哈格蒂氏被一千三百名全学联反主流派学生、工会会员包围，后来坐上了美军的直升飞机才逐渐脱离了危险。在第二天即十一日，在全国的三百六十三个地方，有二百五十万人集会，在国会周围也有二十三万五千人（据警察厅调查有十万人）的工会会员和学生在进行游行示威。

在六月十五日夜，终于发生了死亡事件。十五日午后六时四十分，全学联主流派学生一万人的一部分在国会正门前召开了“阻止休会决议”的抗议集会之后，从当时的众议院（与通用门冲击国会内，对此，八百名警察拔出警棒进行“应战”，因此有三百八十六名警察、四百九十五名学生负伤，东京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学生桦美智子（二十二岁）被压死了。从此以后，警察队使用实力在羽田机场事件、东大事件等事件中，逐渐升级了。

不管怎样，在一九六〇年安保斗争中，特别是在下列事

件不断发生，使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岸首相在民主势力的愤怒吼声面前退却也是万不得已的。

六月十六日艾克延期访日。

同月十七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东京新闻、东京时报等在京七家报社在朝报上发表了“政府应该决心接受国民的高尚见解”的声明，（这个声明的意向不明朗，暴露了大众宣传的限度）。

同月十七日，河上社会党委员长被右翼暴徒刺伤。

同月十九日午前零时，新日本安保条约在参议院得不到承认情况下仍自然生效。是夜有二十三万人的工会会员、学生包围了国会，表示抗议。

同月二十三日，岸信介表示辞职。

把异常事态给予通常化的自民党

从前的例子是，由自民党在一届国会上有一、二次强行表决，充其量最多不过三次，可是第六十一届国会（一九六八年二月——一九六九年八月）上，发生了硬要坚持对十三项议案强行表决的异常事态。自民党接连搞强行表决是要把异常事态加以“通常化”，这样说法也许是适当的。

面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的日美归还冲绳谈判、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大选、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自民党总裁选举等当时的佐藤体制，在第六十一届国会上通过法案来提高其威信。

“都市再开发法案和佐藤内阁的威信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像普通常识那样考虑，都市再开发法案的通过必然会提高威信的佐藤体制，而实际是削弱了。

在第六十一届国会上自民党的暴行，是从一九六九年三月七日的众议院运输委员会上围绕国铁运费法案的单独审议开始的。这样，国铁运费法案的强行通过（三月二十五日在

众议院运输委员会)、总定员法的强行通过(四月八日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地方公务员定年制法案的强行通过(五月九日在众议院地方行政委员会)、历史上最长的七十二天国国会会期延长的强行通过(众议院议会运营委员会)这些都说明自民党的议会运营远远离开了民主的原则。第六十一届国会在议会史上留下了一桩桩不光彩的记录。十三件法案的强行通过只是其一,强行表决带来了有关人员的辞职,而且表明辞意的有七人之多;其中有石井众议院议长、小平众议院副议长、久野众院运营委员长(以上均为辞职),德永参议院议会运营委员长、宫永参议院事务总长、众宗参议院议长、久保参议院文教委员长(以上提出了辞呈,等待进退)。这些自民党出身的众、参两院干部和事务当局干部明知蛮横无理而迫于自民党的压力搞了强制的议会运营,因此,从在野党方面强烈地追究责任而不得不表明辞职的意向。

在野党方面的抵抗是执拗的。在众院全体会议上的大学法案审议从七月二十五日午后七时十六分开会到三十日午前零时三十四分散会为止共一百小时二十八分。这段时间的实质性审议时间是四十八小时二十二分。另一方面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围绕健保法案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继续对立,从七月二十九日午后七时十分开会到八月二日午前八时四分散会为止延长审议时间一百零六小时十八分,实质性审议时间也是四十二小时二十分。

这就大大超过了以前众议院的最长记录的下列三项法案,即一九六七年八月的“健保国会”的延长八十六小时六分,实质是三十小时十六分,参议院的一九五六年第二十四届国会上的教育二法延长审议时间九十四小时十二分,一九六五年第五十届国会的日韩条约审议时间三十九小时五十

九分。另外在第六十一届国会上还有在野党提出的免职、不信任、追究责任决议案二十项也是没有先例的。

那么，在这样忙乱的第六十一届国会上法案成立的情况如何呢？在第六十一届国会上提出的一百一十三个法案中有五十项未审议完——成了废案。通过比率为百分之五十五点七，这在战后有国会以来是最低的记录。而且，由于提高国铁运费法、健保法、太学法、总定员法、防卫二法等威胁国民生活的、民主势力反对的法案被强制表决通过了，儿童津贴法案等国民生活法案一件件被牺牲了，为了保护佐藤体制的威信而抛弃了国民生活法案，佐藤内阁的姿态就如实地表现出来了。从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日美安保条约的自动延长日前后来看，就连自民党也都使国会休会，避免同野党不必要的摩擦。特别是佐藤首相在一九六〇年反对安保的旋涡中，看到其胞兄自讨覆灭的情况，也表示惊叹不已的说：“六月二十二日的国会审议太过了、太过了”。

不知说什么的速记录

执政党的强行表决，把在野党的意抛在一边，表决当时的速记录谁看了都“不能解读。”

——从第六十一届国会速记录看到的强行表决——

提高国铁运费法案

△三月二十五日，众院运输委员会。

（午后七时三十三分会议开始）

细田代理委员长：再开……（讲话者，离席者很多，全场骚动，听不清）

加藤（六）委员：委员长……（讲话者很多听不清）……这样做。……（讲话者多，听不清）……希望。（讲话者多，会场骚动）

第六十一届国会强行表决议案（1969年）

提高国铁运费法案(二法案)	3月25日	众议院运输委员会
总定员法案	4、8、	众议院内阁委员会
地方公务员定年制法案	5、9、	众议院地方行政委员会
会期延长	5、22、	众议院议会运营委员会
关于在冲绳的邮政 储蓄的奖励等法案	5、28、	“ 递信委员会
都市再开发法案	“	“ 建设 “
关于太平洋诸岛委托 统治地域案件	“	“ 外务 “
国民年金法修正案	6、19、	“ 社会劳动 “
健保特例法 “	7、10、	“ “ “
	7、11、	“ 全体会议
	7、17、	参议院内阁委员会
防卫二法案	7、24、	众议院文教 “
	7、25、	“ 议会运营委员会
大学经营临时措施法案	8、2、	参议院文教委员会
	8、3、	“ 全体会议

第六十一届国会上成为废案的五十个法案中与国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二十三个法案（1969年）

在众议院审议中有：

1. 关于许可、认可等整理的法律案；
2. 为在首都圈及近畿圈的近郊整備地带的整備，国家财政特别措施修正案；
3. 自然公园法部分修正案；
4. 厚生年金保险法及船员保险法部分修正案；
5. 船员保险法的部分修正案；
6. 社会福利事业振兴会法的部分修正案；
7. 交通安全对策基本法案。

在参议院审议中有：

1. 见给法等部分修正案；
2. 根据旧法令共济组合养老金额修正案；
3. 公共企业团体职员等共济组合的养老金额修定案；
4. 小笠原群岛复兴特别措施法案；
5. 地方公务员等共济组合养老金额修定案；
6. 私立学校教职员共济组合养老金额修定案；
7. 儿童扶养津贴及特别儿童扶养津贴法修正案；
8. 国民养老金法部分修正案；
9. 农村渔业团体职员共济组合养老金修正案；
10. 珍珠养殖等调整暂定措施法案；
11. 与开拓者奖金有关的政府借出款债权的偿还条件的缓和以及向农村渔业金融公库移交管理特别措施法案；
12. 瓦斯事业法的部分修正案；
13. 简易邮政局法的部分修正案；
14. 建筑基准法部分修正案；
15. 公共用水域的水质保护法部分修正案；
16. 对于琉球政府的米穀出賣特别措施法。

代理委员长：……（讲话者多，听不清，会场骚动）
（细田代理委员长退场）（午后七时三十六分）

会期延长问题。

△五月二十二日，众院议运委员会。

（午后六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久野委员长：现在开会。会期延长七十二天……（讲话者多，会场骚动，听不清）（委员长退场）

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案。

△七月二十四日，众院文教委员会。

（午后七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大坪委员长：继续休息前的会议继续开会。以大学的运营临时措施法案为议题进行审议。

藤波委员：……（发言者多，听不清）

委员长：……（讲话者多，听不清）（有人喊：“赞成”“赞成”“委员长、委员长”，其他讲话者很多）。

委员长：（讲话者多，听不清）（有人喊叫“赞成”“赞成”，其他讲话者多，鼓掌）（大坪委员长退场）（午后七时四十七分）。

△八月二日，参议院文教委员会。

（午后六时二十二分开会）

委员长（久保勘一君）现在文教委员会开始开会。……（会场骚动，听不清）……为议题……。……有赞成者请起立。……（“赞成”“赞成”有人喊，其他讲话者多，听不清）……有赞成的请起立。……起立的人是多数可以通过。（鼓掌）……委员长的……（有人喊：“没有不同意的”）……散会。（午后六时二十七分散会）。

△八月三日，参议院全体会议。

议长（重宗雄三君）：重新开会。我认为刚才那样的混乱，质询、讨论等都是不可能的。休息前的讨论现在停止，以第七项议事日程的议题表决，赞成的各位请起立（讲话者多、会场骚动）（赞成者起立）。

议长：省略委员长的报告，直接对本案进行表决，请各位赞成者起立。（赞成者起立）。

议长：起立的是多数——。

议长：请赞成本案的各位起立。（赞成者起立）。

议长：由于多数起立，本案通过。休息……（讲话者很多，会场骚动）（午后八点八分休息）。

再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在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上表决当时的速记录如下。

藤枝委员（自民党）：委托条约……（讲话者、离席者很多，会场骚动，听不清）。

安藤委员长：……（会场骚动，听不清）……（听不清）……起立多数……（听不清）……委员长报告书……（听不清）……日本这种程度……（听不清）

午前十点三分。

在这里哪个案件成了什么样子也不会知道的。

此后，在九日召开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社会党接连不断的递交对国务相的不信任案，十二日午前零时十八分，船田议长突然提出优先于一切动议的日韩条约的案件，因起立者多数被承认通过。偶尔傍听了当时船田议长和自民党强行通过情况的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可怕的步骤。”

可是，强行表决一定在速记录上发生“变化”。例如一九六七年七月在“健保国会”上审议健保特例法案时，在委员会上强行表决之后“正确”的速记录如下。

佐藤观次郎委员（社会党）：前几天，对我们的同僚本岛委员在全体会议上的答弁像刚才水田（藏相）先生所说的，保险以所谓保险的原则，进行积极的搞……

天野光晴委员（自民党）：委员长，进行讨论，委员长，有进行讨论的发言。请停止质询（讲话者多起来）。

川野委员长：……（讲话者多听不清）。……起立多数……（听不清）……

坊国务相（厚生相）：关于现在的修正案作为政府……（讲话者多听不清）……给以考虑（讲话者多听不清）。
（委员长退场）

午后零时三十六分。

可是，像这样的速记录的委员会议事录没有可怕的强行表决，至少是自民党议员的质问和大臣的答弁有全文记载的。大概，把在委员会室内未听到的“声音”从“有权力方面”事后给补上。速记录之类的东西如落到当权者的手中怎么改变都可以。如果不这样的话，所说通过了的政府案就失去了根据。这只能是最恶劣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公文”。

强行表决还必须搭配上所谓的国会正常化问题。“为了进行正常的国会审议，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和排除机械性的抵抗是必要的。因此在国会内设立由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组成的协议机关”——。

执政党在野党交换这样的文件，以收拾由于强行表决发生的国会异常事态。因此，执政党在野党创建一个国会正常化协议会之类的机关，以议会运营委员会理事为中心进行对话，其结果只在这十年左右才决定下来的。

首先，在野党如果主张：“应该把竭力审议而不能表决的规定写进国会法”，而执政党则要求“同意在野党案的代偿是把不搞机械性抵抗的字句和按电组式的表决写进国会法”。这样以来，为国会正常化的国会法修正问题，别说是两个月，半年也搞不出来，也得经过一年，于是执政党又搞强行表决了。因此，密切注意国会正常化问题，一年到头地在那里进行兜圈子。审议正常化问题的“正常化”尤为先决条件。

希望自民党的自我克制

如上所述，在战后的国会中混乱的次数多至十七次，此外围绕国会的会期、议院的组成等的混乱数一数也将近三十

次，战后的国会每年至少不是一次就是两次发生混乱。

那么，为什么国会这么混乱呢？国会混乱的原因大约有两个。一个是从自民党的策略观点出发，同在野党的对立。

一九六五年围绕农地补偿法的骚动即其典型的例子。由于战后的农地解放，向被没收土地的旧地主发行公付公债，补偿由于农地解放而蒙受的“损失”，这在常识来说是没有道理的。原因是地主制度同战后的民主化是背道而驰的制度，假设给旧地主发行公付公债，那更应首先补偿原子弹受害者即战争受害者的损失。可是，那些旧地主维系着自民党的“选票”，接受旧地主压力的自民党无论如何也必须使农地补偿法案通过。

另一个混乱的原因是关系到党的存在的问题。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骚动，一九六五年的日韩骚动等，把对美协调、促进同资本主义各国的友好作为党的基本方针的自民党，同把打破安保体制、促进同社会主义国家自由交流作为基本方针的社会党的激烈冲突。破防法骚动、新警察法骚动、警职法案骚动（一九五八年）、越南赔偿骚动（一九五九年）、大学法案骚动（一九六九年）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原因。

那么，如何除掉这些混乱的原因呢？除去第一个由于党的策略观点造成的国会混乱，那么政党特别是自民党更必须确立主体性。

以财界、官僚、一部分资本家、旧地主、工商业者为背景的自民党要确立主体性是伴有种种困难的。特别是自民党从财界独立出来是近于不可能的。可是，以投票所表现出来的国民支持率占百分之五十的自民党，这时如不决心改善体质，在最近的将来必然遭到重大危机。

除掉由于关系到党的存在问题引起的对立，首先是在各

党之间进行活跃地“对话”。提交给国会的重要法案的审议，事实上是在政府和在野党之间进行的，自民党事实上是政府说什么都支持的“后援部队”，乃至“赞成投票集团”。因此，自民党和在野党各派连对方的真意也摸不清的情况下固持党的立场，形成胡乱对立的场合是很多的。

所以，为进行议员之间、政党之间的对话，有关重要的法案，以圆桌方式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在政策方面进行自由讨论、公开讨论是有益的。现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谈判，只局限在法案审议如何进行啦，国会混乱怎么收拾啦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根本没有很好进行有关政策方面问题的对话。在政策方面的对话，偶尔在日本广播协会政治讨论会上，各党政策审议干部只搞一点像象征性的讨论。议员大众对于其他党议员在政策方面思考的方式等没有知道的机会。

不过，尽管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有一些对话，意见不一致的事项肯定要留下来的。那时，虽然执政党把多数决议的原理拿过来进行表决，这时也不允许剥夺少数党发言的机会。被剥夺了发言机会的少数党，为同执政党对抗，除了用机械手段的抵抗之外别无他法。一九六〇年的安保斗争中，假如自民党不搞突然袭击的强行表决，院外斗争也能那么波澜壮阔吗？我国的自民党具有“反动的”体质，从本来的保守党差距很大。现在必要的是，是多数党的自民党首先从严守议会民主制的立场出发进行自我克制。

国会Parliament一语源于法语的Parler即是商量说话的语言。国会讨论的事情比表决的事情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可是，自民党经常把在野党的主张看成是非现实的语言，一脚踢开，依靠力量进行国会运营。

自民党所谓现实的姿态，没有任何保证支持国民的东西，只不过是把一些既成事实累积起来。这就意味着自民党把在野党的主张看成是理想的——空想的——在当前，是不现实的，首先必须给少数派提供发言的场所。当然若不这样，代议制民主政治就没有必要了。

英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在第二次大战后成了工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的哈洛尔德·拉斯基曾有过拥护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论述：“不能污辱反对党，必须对重要的少数党表示真心的敬意，忘记了对下院外的舆论动向给予密切注意的政党，是极为愚蠢的，迟早要遭到失败是毫无疑问的”（《议会、内阁、公务员制》）帮助自民党铭记这个教训也是国民的责任吧！

提高议长的权威

还有一个问题是提高议长的权威。

一九六九年健保国会当时，石井众院议长怀有切腹之感的说：“议长作为立法机关的首长同是政府的首长的首相有平等地位，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在国会上，执政党与在野党要冲突的时候，议长是防止不了的，议长连号召国会正常化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无人理采。像这次保健国会议长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议长为什么这么无能为力呢？

第一、议长事实上是由首相指定人选的。自民党总裁（首相）在进行政府官员的人事改选之际，必然也进行议长的“选拔”。虽然议长在“手续上”是由国会决定，但自民党掌握过半数以上的议席，因此，自民党总裁指定议长在事实上用国会的指定，具有同样的效果。从议院内阁制立法机关从属于政府来看，议长靠近执政党而失去了独立性，从政府、执政党方面来看议会被认为是其“附属机关”，从在野

党方面来看，议长被看做是政府、执政党的“走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至少副议长让给在野党的同时，议长脱离本党党籍，在野党也不在议长的选举区出马对抗、学习上述英国这种做法是必要的。若是这样的话自然使议长也不得不“独立”了。在野党出身的副议长也可望其中立性了。

第二是议长自己的姿态。历代的自民党议长都把其职位看做是“自己对自民党多年贡献而获得的‘报酬’”。作为自民党议员功成名就的人，作为升官图“晋升”就任的职位，当然是议长的交椅，而不能是别的。

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年末石井议长对佐藤首相的访问，使议院事务当局惊叹不已：“这也能提高议长、国会的权威吗？”这是石井议长特意到首相官邸拜会佐藤首相说：“因为您访美时，我没有到羽田机场去送您，回国以后特表致意。”诚然，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与参议院并列为唯一的立法机关的众议院的长官，居然到行政机关的首长那里去恬不知耻的极尽拍马迎逢之能事，未免有些轻率吧！努力提高议长的权威，首先，不能不由议长本身的话来表现。还有常任委员长的职位也必须按各党的势力进行合理分配。按需要有关国会的运营在野党也应分担责任。

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大选中，自民党获得了三百个议席的绝对多数，按理说是应该领导议会的民主运营。可是，现实的自民党由其背后的财界操纵控制，具体的国会运营也受官僚乃至官僚出身议员的牵制。这里也表现了自民党、财界、官僚紧密勾结的弊病。